

# 一号文件的历史性解读

● 余广人

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说:“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第六个一号文件为什么把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主题?“一号文件”为什么在18年后重新出台?如何正确地全面地贯彻落实这个文件?本刊编辑部邀请吴象、王郁昭、张广友、陈大斌、宋洪远、白南生等农业问题的专家座谈,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解答。

## 一号文件的八大“亮点”、四大主题和两个突出关键词

18年后,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让农民增收成为文件的主题,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文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和政府时刻惦记着9亿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些,在这个让农民感到非常亲切的文件中都有所体现。

“一号文件的政策之多、力度之大相当少见,是多年来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的文件。”“含金量”在何处?与会者议论纷纷,具体总结出带有创举和突破的八大“亮点”:

### 亮点1 财政支农力度前所未有

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传递出国家鼓励农民种粮食的重要信号,在统一城乡税制的政策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 亮点2 突出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

多年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0%左右,抓住了主产区,就稳住了全局。今后,中央将启动规模宏大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对推广良种给予补贴,对主产区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补贴;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

### 亮点3 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目前大家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逐渐一致,即要逐步地走向市场。但问题是,在目前粮价较低的情况下放开粮食市场对农民造成的损失怎么办?中央经过认真考虑,提出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从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用来直接补贴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约302亿元,即拿出不少于100亿元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非粮食主产区也有粮食风险基金,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对此,国务院也将研究出台专项文件。

### 亮点4 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件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尚属首次。文件里,关于保障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障外出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都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要求。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二、三产业中就业的员工有46.5%是农业户口,目前这个比重还在继续提高。即使使用2000年的数据,在服务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也已占到52%,加工制造业中超过60%,建筑业尤其是建筑工人占79.8%。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受过好的科技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当前城镇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地从生产第一线退出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工短期内又很难成为熟练工种,如果不注意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仅不利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最终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因此,文件顺应时势,提出重新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的问题,并将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作为重要的战略考虑。

亮点5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是1984年中央继一号文件又批转农业部的报告(即45号文件)而注入活力的。其“异军突起,短短几年飞速成长”(邓小平语),主体规模和就业人员几乎与国有企业相等,创造出了出人意料令人惊喜的“工业奇迹”。如果说联产承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商品经济的细胞,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那么乡镇企业则引起生产要素的横向流动,使城乡分割的森严壁垒受到一次又一次剧烈的冲击,从而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的总目标。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已转移了1.3亿农村劳动力。文件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不论所有制,不论规模大小,只要企业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和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就应该促其发展。

亮点6 征地制度改革引人注目

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事实上基本没有区分。其后果至少有三: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

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形式强制征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政府变相成为经营主体后,背离了其职能,对土地的管理陷入盲区。因此,无论对于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还是对于政府职能转变,这次征地制度改革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亮点7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对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支持农业作出硬性规定

文件明确了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的义务,要求其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该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是一个新的创举。

亮点8 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农业税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减负也是增收,预计这两项加在一起,可以让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二是加快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包括基层机构精简、人员精简、农村教育资源的重组和合理利用等。

从总体上来说,一号文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与会者分析说,从文件来看,共分9大部分,围绕着促进农民增收这个主题进行了近万字的论述,文件主要突出了4大主题。

第一大主题,文件在第一和第八部分对如何解决农民增收中的两个难点和重点进行了阐述。要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收。继续作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第二大主题,关于农民增收的具体途径,文件指出:一、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挖掘农业内部农民增收的潜力。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三、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让农民通过进入城镇就业获得收入。

第三大主题,文件的第五、六、七三部分,对如何为农民增收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作了重点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加大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倾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要重点抓好4项改革:第一,改革征地制度。控制征地规模,尽量少

占用耕地,占用之后必须妥善安置农民,并对其进行合理补偿。第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第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农业税降低1个百分点的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精简基层机构、人员,对农村教育资源的重组和合理利用。第四,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村信用社改革2004年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

第四大主题,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文件的最后部分强调要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的落实。

此外,与会者还指出,第六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有不少,但这样两个关键词尤为突出:

1、科学的发展观。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等,都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协调的问题。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高度重视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实际上是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2、正确的政绩观。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不富裕,整个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因此,真正的政绩不在于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不在于搞了多少漂亮的大工程,而在于这一切是否能够带动广大农民持续地增加收入、不断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文件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绩观,既考虑到中国农民的数量庞大,增加农民的收入显然只能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这一事实,又提醒基层甚至是地方官员要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做事。

文件上述的八大“亮点”、四大主题和两个突出的关键词说明,第六个一号文件不但抓住了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键,也代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它的出台,是与当前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新一届政府的重农思路密不可分的。

## 目前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厚望和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再次面临一个新关口。以向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而广为人知的李昌平,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概括“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以至于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他们最关心也最忧心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些与农民打了



图为座谈会会场,从左(黑衣者)至右(顺时针)依次为:宋洪远、白南生、张广友、杨继维、吴象、王郁昭、杜导正、陈大斌、徐孔、吴思。(摄影:徐庆全)



吴象

王郁昭

多年交道、对农村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们，从农村历史的发展给出了答案。

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曾长期负责农村报道的陈大斌认为，第一，改革之后，农村迅速发展，商品率提高，农业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而这时农产品流通体制却还是计划经济的老一套，粮油棉由国家统购统销，其他多种产品也是计划收购。这就造成了流通渠道的梗阻。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体制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体制有责！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体制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根本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倡导包产到户的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则从改革开放所经历的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谈起，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重点是在农村，也就是1978-1984年这个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城市。从两个阶段的发展来看，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他分析说，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

碰撞和磨擦。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上面随意开口子，要下面给钱，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在无奈的情况下，下面只有向农民伸手，因而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收回了。

王郁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中部粮产区，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因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本社副社长吴思80年代曾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他用经济学上著名的“恩格尔系数”从更深一个层面揭示其原因：

农业和农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必定造成食品开支在家庭总开支的比例下降，即所谓恩格尔系数下降。总不能老花百分之六七十的钱填肚子。于是搞饭吃的人也要从百分之六七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四十，人数下降，收入就会下降。这是三农问题发生的基本历史背景。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政府起什么作用？第一，是消除城市化的障碍，还是设置障碍给农民添麻烦上枷锁？第二，留在农村的务农人口，已经很穷了，是帮助他们，还是继续搜刮他们？这两个问题是政治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的。

吴思将这两个问题称之为政治性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的改革进行了20多年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在农村尤其如此。三农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什么?就表面现象来看,主要体现在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和农业的衰退问题。但背后因素是什么?本社社长、在新闻界有“农民记者”称号的杜导正认为,说到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他分析说:

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的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三部法令,基本上构成了我国农业法律制度的“三驾马车”。应该说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但使农民没有法律依靠,而且使农村机构臃肿膨胀。据报纸的报道,在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从某些方面来说,成为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

上述专家的种种分析表明,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是我国农业结构加快调整的时期,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但不容讳言,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时期。

## 新一届政府的重农思路

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新一届中央刚刚选举产生不久,为准备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在2002年1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了

非常重要的铺垫。

为简化会议程序,中央在1997年作出规定,各个行业、部门的会议,除分管领导外,中央领导一般都不出席和讲话。2003年初,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惯例。胡总书记在会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解释了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因此可以说,2003年从上到下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比以前提高了。

2003年底,第二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号文件时隔18年重新回来,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最好体现。

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参与这次一号文件起草的宋洪远,详细地介绍了一号文件出台的过程:

一号文件的出台,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增收形势依然严峻;二是农民增收问题事关全局,农民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业、农村、农民,而且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三是2003年中央3号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已经对200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因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可以更加集中一点。

2003年9月30日,文件起草组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中央9个部门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参加。他

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专家、思维活跃的学者,又有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新一届领导集体为掌握全面情况,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调查研究。

2003年10月1日至4日,胡锦涛来到湖南农村,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希望大家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断推动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他强调,粮食问题是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和加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依靠科学技术,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完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2月12日至17日,胡锦涛专程到河南、山东两省调研。他每到一地,都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探讨如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加。

山东、河南两省是粮食主产区。胡锦涛非常关心这里的粮食生产情况和农民增收途径。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增收面临的突出问题。

同时,温家宝等国务院领导也多次就农民增收等问题进行调研。

2003年12月初,温家宝在听取文件起草组汇报时强调,当前农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种粮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而具体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回良玉副总理,则对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提出指导性意见。宋洪远说:

文件起草过程中,回良玉副总理专门召开三次座谈会,分别邀请有关专家学者、部分老同志和部分省主管负责同志座谈分析农村形势,听取他们的意见。回副总理用两个“最”描述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形势。“第一个‘最’是,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第二个‘最’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难。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

主题,是非常必要的。”

他强调,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文件起草组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始终把握这样几条原则:1、注意保持农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力求主题鲜明而集中。文件研究提出的有关政策措施都与农民增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力求政策实惠而有操作性。农民最讲实惠,农村工作也最讲实际。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大政方针已很明确,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力度较大、实实在在、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并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4、力求重点明确而突出。政策支持的着力点突出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近几年,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主产区,粮食生产不稳定很大程度也在主产区。主产区现在面临的困难较多,需要国家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

据悉,由回良玉副总理领导的起草小组分3个层次:一是领导班子,由各有关部门的部级领导同志组成,负责研究确定文件的重大问题;二是各有关部门的司局长,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三是工作班子。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协调不下二三十次。文件组各个层面都多次组织座谈会。宋洪远提到的回良玉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三次座谈会:第一次,请农业和农村方面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次,邀请德高望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老领导,包括部长、书记、省长,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三次,召开部分省区市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座谈会。文件起草班子也多次进行调研,召开部分省区市的农业综合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调研、讨论、修改,再调研、再讨论、再修改,一号文件越来越成熟,措施越来越具体。

12月3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送审稿)》,对集

中力量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等9个部分表示原则同意。

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刚从山东、河南农村结束考察返京后的第二天，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同意将农民增收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

新年伊始，反映9亿农民心愿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出台了。

与会者在对一文件叫好的同时，对于如何将这些给农民好处的条款落实到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文件的生命在于落实

“文件的生命在于落实。无论多么好的文件，不能落实都是空话”。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推动安徽农村改革，后来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脱口而出。他回顾历史说：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前五个一号文件，给了农民自主权，给了农民实惠。但是就在那时候，也出现了“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的问题。所谓“二号文件”，是农民对政府部门规定、条例的统称。一般说来，中央的政策要通过各职能部门才能贯彻执行，这些职能部门所出台的二号文件，比中央的一号文件要重要、要直接、要管用，因为他们是直接管农民的。在当时，中央是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在第三个一号文件中曾专门指出：对于类似的“二号文件”，各部门要清理、撤销、纠正。当然，有的办了，有的却硬顶着。现在流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也就是在那时开始流行的。

谈到第六个一号文件的落实问题，吴象认为，对落实过程中的阻力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尽管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当成工作的“重中



张广友



陈大斌

之重”，而且这种看法也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件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旧观念、旧体制的阻力仍然不可低估。像八十年代那样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大概不会再有了。但在一片叫好声中暗中抵制的，肯定大有人在。

按以往习惯，被人们批臭了的“二号文件”总是阴魂不散要“表演”一番，这又不免令人担心：中央“促进农民增收收入”的措施，会不会被某些地方打“折扣”。犹记得，前些年中央主要媒体还发表了《一号文件要管二号文件》著名评论。其主要精神，就是要求各地的土政策不能取代中央一号文件的大政策。

吴象认为，在基层农村，这种“二号文件好狠”的现象是与利益挂钩的。他分析说，“三农”问题的积累和加剧，年深日久，非一日之寒，各级各地方各部门和基层干部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把应该给农民的钱截留了，扣押了，吞没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甚至以“支援农民、救助农民”的名义来剥夺农民。只要上面有什么新的任务布置下来，他就能把权力的手伸得更长一些，到农民的口袋里去捞。

熟知农村情况的杜导正，很赞成吴象的分析。他接着说道：

前两天新华社记者报道说，记者去采访一号文件落实情况，有的正层层下发文件。怎么落实？记者问县委领导，回答是“等研究后再定”。记者再问村里的领导，领导回答说：“几项重要工程都忙不过来，哪顾得上什么一号文件。”另一则报道说，四川成都派干部下乡整治“歪嘴和尚”，发现全市900多个行政村，违背国家和省市政策而规定的“土政策”，竟有1087项之多。为何有

些部门总是乐此不疲地制订“二号文件”？我同意吴象的分析，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出台“二号文件”的部门、政府，说白了就是希望执行大政策的过程中，实现部门的小利益，因此要彻底清除“二号文件”，关键在于能否清除小部门的利益。否则落实政策从何谈起？应该清醒地看到，“一号文件”只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但需要细致、扎实、艰苦的工作，也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我很担心长期以来下面所形成的一些规则，阻碍一号文件的落实。”在农业部工作、老是下农村基层了解情况的白南生，对一号文件能否落实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赞同上述的分析，并谈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他说：

一号文件很好，但是实际遵照执行还是仅停留在口惠上，的确与农村基层干部有直接的关系。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要让中央文件的精神能深入落实下去，必须打破基层的一套规则，首先要打破利益上的关系。这就需要体制上的改革。

对于基层的一套规则，农民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这个比喻，既隐喻了农民的辛酸，也道出了“二号文件”甚至“三号文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实情。在部门利益不仅没有理顺反而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以部门文件和部门立法来规范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果，必然使中央良政变成地方恶政。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而这一内容，也没有进入决策视野——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来积累的问

题全部解决。由此说来，与会者所提出的从体制上改革，的确是道出了一号文件能否全面落实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都发出一号文件，其对农村高度的关注和政策的连续性，强力肯定、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五个一号文件固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动员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势，为农业改革发展破除了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使农民、农村所蕴涵、压抑多年的活力、动力、潜力喷薄而出，势不可挡。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再次陷入困局，其原因也不在于中央少发了一号文件，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一系列新的情况构成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新的约束条件，那些“二号”、“三号”文件甚至成为新的体制和制度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三农”问题新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场农业变革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取得这样的共识后，与会者围绕农村体制的改革畅所欲言。曾亲历安徽农村改革、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的张广友分析说：

新的一号文件直接以“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标题和核心内容，并提出多项具体措施。这其中既有挖掘农业、农村内部潜力的措施，也有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搞活农产品流通，及鼓励、帮助农民进城务工等多项措施。而后一类措施的落实和实现，不但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互为因果，而且必然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比如不管是加大

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是放开农产品价格，都必然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个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涉及到体制的改革。这就既需要党和政府的决心、勇



宋洪远

白南生



气、智慧,也需要包括城里人——可能尤其是城里人——在内的每个人的理解、支持,甚至某种牺牲。

王郁昭同意张广友的分析,他把工业和农业、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比作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协调一致,才能解决好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指出: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在农村。这些矛盾即“三农”问题解决了,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逐步走上富裕,走上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其他各种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陈大斌认为,只有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负担。他说:

为农村减负,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也曾出台不少规定,但成效并不大。为什么?因为乡村两级干部过多,而且大多数要农民供养。只有通过基层政权的体制、机构改革,建立起精简高效的基层政权、服务体制,大量减少“脱产干部”,农民的负担才能减轻。第六个一号文件的确提出了许多减负措施,力度不小。但如果不进行基层体制改革,真正实行起来也难。即使这些方面的负担减下来了,只要那么庞大的吃饭队伍还在,税不许收了,但肯定又会生出新名堂,再收其他名目的“费”。基层政权的体制、机构改革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从第六个一号文件的内容来看,虽然关于农村体制的改革从总体上论述不多,但文件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体制上的改革实际上也呼之欲出。与会者的上述议论,正是顺应这一思路来的。

20多年前,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万里,在晚年回忆当年农村改革所走过的历程时说: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

后千万不要再丢了。

虽然现在农村改革的形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必须要改革,则是人们的共识。第六个一号文件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群众的需求,在执行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里所谆谆告诫的这一条党的“十分重要的经验”,依然需要人们尤其是基层干部挂怀在心头。

犹记得,20年前那令人难以磨灭的一幕: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当一列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时,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农民那开心的笑脸历历在目,人们那欢呼的激荡言犹在耳。

如果说,20年前的五个“一号文件”,使凋敝的农村走向繁荣,那么,今天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则是在全面分析了农业新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后,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创新。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牵动着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本刊编辑部和与会专家学者的心。《人民日报》在为第六个一号文件所发表的社论中号召,“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各行各业都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努力营造支农护农的良好氛围,尽快实现农民增收的新突破,开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局面。”本刊在浓浓春意中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也是响应这一号召之举。作为个人的一管之见,不论全面还是片面,都饱含着对农民和农村摆脱“真穷、真苦、真危险”处境的拳拳之情。

春天孕育着希望,让农民亲切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与季节一道,催生着生机勃勃的大地。人们有理由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农民那久违了的开心笑脸,那热烈欢呼的激荡声音,重新成为定格在历史上的一幕。(责任编辑 吴思)

# 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笔账

● 李昌平

##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及其成果

第一阶段大体是 1978—1983 年。主要标志是 1980 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包产（包干）到户，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包产（包干）到户，本质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有限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粮食剩余，有了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的解读为以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 250 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大体是 1983—1990 年。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 1984 年 1 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本质是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 1% 的农民成为老板，约 10% 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 1990—1996 年。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本质是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村老板和敢闯敢冒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农民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 6000—8000 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 6000 元）。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改什

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总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利。

第一步改革开放就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和农产品的收益权。随之,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农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随之,农民有了积累,有了购买能力,有了投资的冲动。农民购买力的扩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民的积累,为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原始资本。

第二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主权。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一个乡镇企业就像一艘大船,企业家就是船长,农民工就是船员,他们扬帆启航,可是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沟河港汊满足不了他们乘风破浪的欲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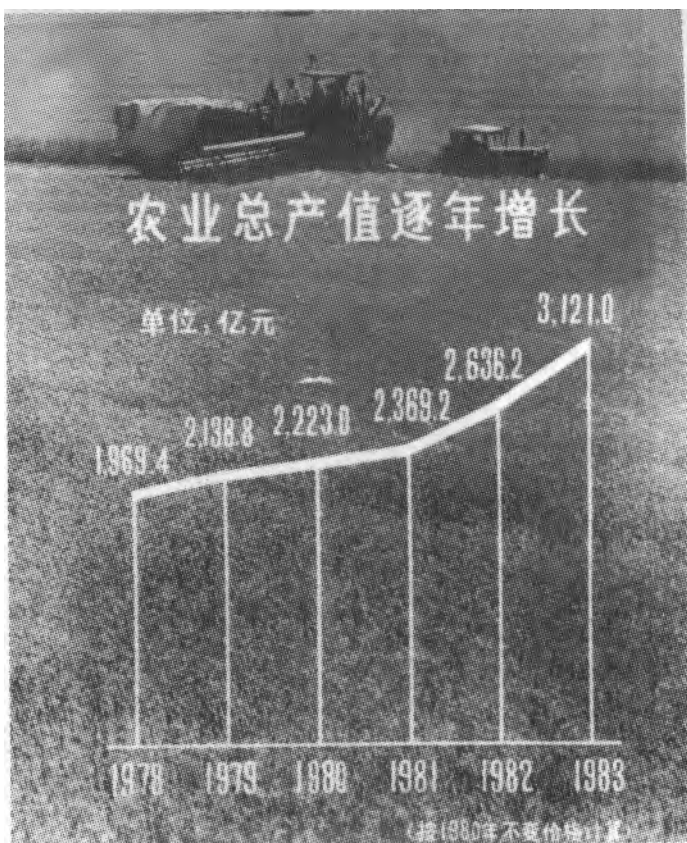
第三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农民企业家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就业的机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我国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国营退、民营进”。是按照两根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过程为:束缚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乡镇企业)——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过程为:没有经营

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全国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外)。

经历了上述三步,成功的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家庭承包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中共中央随之在1983年作出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在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



农业总产值增长图

提了出来(杜润生《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坚持不懈的鼓与呼》)。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的步伐缓了下来,致使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了大的损失。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我个人认为是直接导致90年代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家庭承包,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在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名义下,这一段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人员此时竟高达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我国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这就是说,到80年代底,第一步家庭承包的改革成果就被我们这种政治体制消耗掉了;进入90年代,政治体制开始消耗第二步“离土不离乡”的改革成果,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西部

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94、95、96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6年底,我们这种政治体制又消耗掉了农村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1997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捐税,这就是说,农村第三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成了我们这种政治体制的美餐。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机构和人员的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导致农村发展缓慢,我个人认为,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总希望改革有捷径可走。其实,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确无误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还等什么呢?再也等不起了!

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那么,政治改革就必须按照其必然的逻辑稳步进行下去。眼前,一方面就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农村民主,在积极推进村民自治的同时,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在总结民选村长经验的基础上,推行村支部书记“两推一选”,在总结四川步云乡直选乡长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乡镇长直接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党内直接选举的试点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乡村社区内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部门,对损害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权,都必须作出有计划的主动退出的制度安排。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柳暗花明!

(责任编辑 杜晋)

# 陈独秀：除却文章无嗜好

● 叶尚志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

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方面，著述很多，分量很重，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得也最密切。他从一起步，首先就对创办报刊、文论、诗论（白话诗文与旧体诗文）、小说（创作与翻译）、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语言文字研究等等，情有独钟，然后逐渐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

有论述、见解或创作实践。他自己从就读家塾、科举应试、初入社会，到他晚年都自认为一介书生。他年老在南京监狱一诗中说：“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就是他的自我写照。可是这位书生与众不同，且不说他一生在盛年时代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非同凡响；就是在文化上的见识、作为和建树，就总体来说，在同时代人中无人能出其右。只要初步接触一些他的文论、创作，就不能不惊叹他见多识广，胸中拥有古今中外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特，与人生、社会和政治结合之紧密，逻辑与创新之交融，观点之大胆、鲜明，气势之磅礴、夺人，论述之流畅、



陈独秀

易懂，可以说无所不涉，无所不通，才华横溢，是中文坛灿若晨星中的一位旷世的文化奇才。

下边谨列举深切感到的几点，作为参考。

——陈独秀先生15岁那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此时他就关心国事，萌发了爱国思想。他17岁考中秀才第一名，翌年到南京乡试考举人，深感此道于国无益，并非所愿。他早就厌恶老八股那一套了，却自作三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扬子江筹防刍议》《湖中水师》。后两篇已难搜集，首篇存世，充分表达了他胸怀大局，

关注国运，颇有见地。一个18岁的少年，居然有这等境界，也是极为难得的了。他初入社会，痛感外侮日甚，国将瓜分，而国人还多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不知作亡国奴的悲惨处境。他早就立志扩大宣传，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务。这是他后来大力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滥觞，终生不辍。

陈独秀从1902年《苏报》被查封之后，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结交，创办《国民日报》，人称《苏报》第二，共任总理编辑事务。章士钊后来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当时二人“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他发现陈的内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苦行如此。此报只办了三个多月，因清政府严禁等原因而停刊。翌

年,陈独秀雄心不死,又在安庆编辑、芜湖设社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挚友汪孟邹协助,由社会人士捐助,陈自任编辑,每天喝两顿稀粥;因无印刷厂,每期要寄到上海印刷,分发、邮寄、打包、一切杂务均由陈自己承担。他和在上海办《国民日报》时一样,自述“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虽臭虫布满衣襟,也不自觉”。他就是这样不顾衣冠,不计饱暖,舍命地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目的是“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确实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面向工农兵学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时事、政治、知识、文艺报刊。这也是他后来大力提倡白话文,以收开启民智速效的一次最初的尝试。蔡元培后来说,那时候他在上海从事《警钟日报》“和陈仲甫的《安徽俗话报》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此报虽因困难重重,办了22期,经过一年半停办,但它在弘扬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宣传科学与民主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永远载入史册。

——陈独秀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不同凡俗的诗文大家。他对诗文的实践和论述在清末民初早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从八股迂腐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神州禹甸破土而出,闯出一条新路,开启了新一代文风。他对诗文都努力实践与胡适联手揭橥的宗旨。陈倡言文学革命,比较激进;胡主张文学改良,比较和缓。陈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竭力倡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这些主张一经刊出,便震动全国,他的学生、追随者、革命后辈,乃至现今,都能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影响,说他功在千秋亦不为过。他的文章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或文白相间,口语、成语、谚语孳杂,富于文采;总是旗帜鲜明,每有卓见,词锋锐利,语味辛辣,分析透彻,令人折服。当时李大钊说:“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1990年公映的《开天辟地》电影中,再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作为领衔人物,被捕出狱时,受到各界结队热烈迎接的情景,北大打出横幅:“陈独

秀就是真理”。他的北大学生、海峡两岸和中外著名学者傅斯年(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在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后所写《陈独秀案》一文中,追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陈的杰出表现,说:“他(是)在思想上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大彗星之理”。可见评价之高,影响之大。

他的文章随处可见,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是他通日语、法语、略通英语、俄语,似鲜为人知。他作为师友帮助苏曼殊译过《惨世界》,即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又仿《惨世界》,以揭露中国旧社会众生相为题材,创作《黑天国》这部社会谴责小说,更少为人知。两著曾在《国民日报》和《安徽俗话报》连续刊出;终因两报先后停刊,未竟其稿;虽后来也出版了专书,但结尾阙如。陈此后忙于更多社会活动,未再拨冗从事小说创作,不免可惜。

——他很懂诗,作的诗更有特色。本来他少年“进学”成为秀才,旧学功底深厚,旧体诗信手拈来,一挥即就。但因旧诗讲究音韵格律,太费工夫,所以他对青年学作古诗“不提倡”。他为了文学革命,提倡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连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新诗;他自己也第一次写了一首新诗《除夕歌》(亦名《我与他》)作为尝试。此诗将穷苦人民除夕之艰难和富人的奢侈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口语化,通俗易懂,却寓意较深。他不论对新诗、旧诗都讲究“美的语言”,“美的意境”,要懂得“诗味”。即使写新诗,他建议最好先学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有人问他政治思想可否入诗,他作了肯定的答复,但说难度很大,要有高明的手法。有的不下功夫,写成套话、口号、公式,“味如嚼蜡,毫无生气”,“结果把诗弄成屎”,成为可悲的笑话。安庆是诗文戏曲之乡,新旧诗文传统深厚。从《孔雀东南飞》到徽剧、弹腔、京剧、黄梅戏,哼唱普及;戏曲唱词多用五言、七言、十言,往往文白相间,又口语化,有韵有味,通俗易懂,是介于新旧诗文之间的桥梁。我认为这也是陈先生诗文的一种丰厚的营养来源。

陈独秀先生后来常在与友人酬唱中做旧体诗联相赠,其意境、情景、遣词、用句、对仗、音

韵、风格、诗味十分讲究,但毫无矫饰、雕琢痕迹;表达了他的固有人品、学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他是近现代诗界之人杰。

他在南京坐狱五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是挚友汪孟邹避开检查,夹带出来的;后人有幸逃过了“文革”浩劫,交到党的一大纪念馆保存下来,成为宝藏,也真难得。兹选录两首七绝:

## 其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 其二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针砭时政,偶尔抒发豪情感慨,倾吐心声,属于豪放、忧愤诗一类。诗为旧体,文中有白,民谚、口语、成语、典故、新旧名词、时事政治交叉出现,信手拈来,自成一格。诗的政治性鲜明、强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冷嘲热讽,极尽能事。诗中精品不少,但也偶有率性而作,少下锻造功夫之句;其内容都是健康、进取,帮助人们关心国事,分清大是大非,激发人们爱国爱民,奋发有为。这可以说大都是政治诗。正如他所说是非常难能,所以特别可贵。

——陈独秀的文化论著还涉及桐城文派、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等等,都是安庆地区渊源深厚、非常普及、赫赫有名的文化领域;也是陈独秀先生自幼就不断接触、最熟谙的文化门类。他毕生从事文化启蒙运动,自然对此极为关心,有许多独到、卓越的见解。例如,对桐城文派,有许多论述,震动文坛;评者观点纷呈,都不否

定陈氏见解独特、振聋发聩,这里不赘。陈对绘画、书法讲究性灵、风骨和品格,既着眼于社会需要,又讲究提高创作者的精神境界。他对五四时期老友、书法家沈尹默关于书法要注意防止媚俗的诤言,影响沈先生一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例。他为贫弱女子潘玉良取名并证婚,见她绘画有灵气,竭力支援她到法国深造,终成大器;潘三十年代初回国在南京举办画展,竟冒风险展出恩人陈独秀画像,传为佳话。

即如戏剧一项,安庆是产生徽剧、弹腔、黄梅戏文唱武功的祖地,又是京剧鼻祖高朗亭和伶圣程长庚的故乡,也是京剧的发源地之一。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在安庆地区历来非常发达,草台戏班非常普及。

他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从文化启蒙、“开通民智”、社会教育的角度,发表《论戏曲》等宏著,破天荒地提出了戏曲是“男女老少都诚心乐意接受他(它)的教训(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说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提出了“戏曲改革”的口号。提出“要多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如对话、讲演、布景);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除去功名富贵的庸俗内容;排时事新戏”;等等。这些卓越的见解在百年前发表,大大地超前,他真不愧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先生一生以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为职志,他慧眼识珠,感悟锐敏,思虑深远,对祖国文字研究情有独钟。从他抱蒙识字,就深感初学方块文字“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感受其损”。他大声疾呼:“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这是他在即将辞世前为《小学识字教



1922年11月,亚东图书馆出版印行的《独秀文存》

本》所写《自叙》中的谆谆遗言。

以他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早就察觉到文字对于扫盲、对于文化启蒙，对于人的教养和成长，对于民族素质之提高，对于国家之兴衰，关系极大。所以他早就立志研究祖国的文字，致力于文字教学方法之改良和文字之改革。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作为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却早在清末风云激荡的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在政治纷乱的情况下，他又撰写了直到1925年才出版的《字义类例》著作。他被黜退出领导岗位后花了很多工夫，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年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坐牢的五年中，仍未忘记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着想，与他过去一样，仍然把生死荣辱置诸度外，心境平静，精神奋发，把“监狱当作研究室”、“当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依然锲而不舍，研究、写作，尤其是钟爱他所关心的文字学。终于1937年出狱之前，又发表了《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出狱后于1940年在国难当头、年老多病、贫困度日、衣食不周的艰难情况下，仍然研究不倦，写成《小学识字教本》一书。这不是一种儿童识字课本，而是专供语文教师及所有知识分子参考的一本学术著作。由当时他的好友、安徽同乡（早期曾是中共党员）台静农先生中介、协助，书稿送到国立编译馆，已预支稿费5000元；可是该馆不得不送重庆当局的教育部审查，部长陈立夫亲自致函要将书名改过来，为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先生所拒绝，他宁可忍受贫困，将稿费退回，也不从命。不巧又遇窃贼将衣物书稿偷去。他自述1939年早就患高血压达到过230，这时仍不得不带病重新补写，当写到一个“抛”字，终未完稿而逝。书稿经过辗转耽误，直至1971年才由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出版；后经武汉语言学家严学先生以所藏底稿抄件校勘，到1995年才由巴蜀出版社出版（陈的至亲吴孟明先生为文指出，此版有不少讹误，希望纠正）。梁、严二位学者，对陈独秀先生之稿均有高度评价。梁认为，该书采用了科学方法和新的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又“简明扼要，易于了解”。严认为“陈先生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并带着深厚的感情

说：“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敬悼乎？”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晚年消极悲观。但从他不改初衷、执着研究文字学，执着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带病写就《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等观点鲜明、很有分量的文章来看，诚如其自谓“除却文章无嗜好”，真可称为“依然白发苦行僧”，这就足以否定“消极悲观”一说了。

——陈独秀先生最早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口号提出，他一生对此论述颇多。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要素，是针对我国国情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反愚昧，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与科学，是贯穿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灵魂。它击中了我国一切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保守观念、愚昧、迷信的要害，足以医治我们民族贫弱落后的顽症，起着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辟路奠基、扶正祛邪的巨大革命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至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仍然应该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独秀先生认为，民主是历来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成果，“是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得利用民主的基本成果维护它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它的民主有其真实性一面，也有其虚伪性一面，与其他任何专制和与法西斯体制不同，对之要作具体分析。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最早看到前苏联违背了民主政治，是一种倒退；他以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广阔的胸怀，毫无偏见地认为，这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他在晚年又强调：“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使）世界上出现了……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他的论述似乎使民主问题大大超越了文化的范畴，但就广义来说，民主显然是政治文化问题，仍然属于文化范畴之内。在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氏当初之远见卓识。

（责任编辑 吴 思）



# 李克林新闻生涯的三大风波

● 宋 瑛

克林大姐走了。被疾病折磨得太久、太苦，她应该安息了！

老太太早有遗嘱：去世后，不留骨灰，遗体捐献，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回归了自然。尊重逝者的遗愿，我和老伴燕凌不能为她送别，只有献上一副对仗不工的挽联寄托哀思：

毕生为农民争自由  
一心为新闻求真实

## 老是个农村女干部的形象

1946年7月，我和燕凌被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分配到人民日报社。那时候，报社刚从邯郸城搬到武安县的南文章村，不久又因备战搬到河西村。报社的食堂设在村里关帝庙，当时叫“伙房”。每次吃饭，总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身穿一件旧土布带襟褂子，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后来知道那是她和林韦的大女儿小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寄养在农民家里，不久前才接回身边的），一手提着打水或盛饭的小罐罐，说起话来直言快语。她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李克林。那时候《人民日报》每天只有两个版面，第一版以时事新闻为主，第二版以地方工作报道为主。她是第二版的一位主要编辑。

虽然当时的女同志都不打扮，可是站在一起她却显得更像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听说她原先是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初期奔赴延安，后来长期在太行山做农村工

作，非常熟悉农村情况，来报社前是太行区赞皇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我想，她大概就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吧，心里暗暗敬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许多人和事在脑子里已经被时光冲刷得模糊不清了，克林大姐这个“农村基层女干部”的形象仍然深深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也许是以后的一些事情不断加深了我的印象。

大概是在我们都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克林与原来同在报社农村部工作的郝洁同志一起到附近商店里买东西。她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讲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克林笑答：“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营业员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老太太不久前还是《人民日报》的农村部主任。

直到她去世的晚上，我和老伴到她家去，看到柜子上放着她的一张大照片：她仍然穿着一件带襟的棉衣，发式和五十多年前在乡下的时候一样，手里织着毛活，安详地坐在院中。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进北京城该已好几年了，看起来仍然是河西村里的李克林那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村女干部。

## 老是被认为“右倾”

进城以后，她在人民日报社的半个世纪，仍然主要从事农村工作的报道。

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为了使报社的同志们及时地准确地了解中央领导合作化运动的意

图和运动发展的大势，“老邓”（邓拓）同“邓老”（邓子恢）商定，派她长驻中央农村工作部，叫做“联络员”。当时报社没有这样的先例，派一个记者长驻中央的一个部。派她去，这一方面是由于报社重视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因为她熟悉农村工作。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时间不过几个月，克林在思想上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她原先熟悉的是战争年代老根据地的农村，这时候面对的则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情况，她未免感到陌生。农村工作部机关的许多同志，是她在太行山时候的老领导、老同事。这几个月，她和他们亲密无间，一起参加大小会议，看文件，听汇报，一同了解情况、分析问题，俨然成了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而不像一个记者。特别是当时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同志，经常传达邓老对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和指示，

把邓老和其他同志经常一起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也告诉克林，使她在新时期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受到深刻的教益和启发。邓老的最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切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这使她在怎样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观点更加鲜明、意志更加坚定了。针对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急躁冒进倾向，她在这几个月里写了一系列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评述农村工作的文章，观点鲜明，材料生动，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可是，好景不长，邓老突然被党的最高领导指责为“小脚女人”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农村工作部有人悄悄告诉克林：前不久，邓老找毛主席反映农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主张不要过多地增加合作社的发展数目，两个人争执了大半夜。报社领导同志对克林说：“回来吧！”

克林无可奈何地说：“不言自明，不能再去联络那个‘右倾’部了。”就此回了编辑部。邓老和杜润生同志被指责为“右倾”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各地党委纷纷向中央打报告检查“右倾错误”，追加发展合作社的数字，并且加快“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真是神奇！毛主席说“高潮就要到来”，“高潮”果然很快就到来了。而且大部分合作社是“一步登天”，没有经过互助组、初级社，一下子就实现了“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化。

面对这样的“疾风暴雨”，克林大惑不解，她说，这是她在党的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突变”。邓老开始挨批的时候，她刚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如此“自愿”》，说的是某地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场院里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宣布：自愿入社的到东边桌子来报名，不愿入社的就到西边去；东边连着北京，西边通向台湾。许多农民本来还犹豫不定，听到干部这样一说，呼啦一下都到东边去了。已开始大批“右倾”，这篇文章当然只能悄悄地收起来。可是，这“两张桌子”的场景，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农民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一哄而起，这是真的“高潮”吗？邓老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究竟有什么错？后来的实践证明，过快过急的“社会主义



李克林（摄于50年代初）

改造”，给生产力造成了长期的深重的破坏。真理还是在邓老一边。后来克林在怀念邓老的文章中说，从延安到太行，到北京，她对毛主席长期十分崇敬，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可是，1955年批判邓老以后，她的虔诚之心开始有些动摇了，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了。从此，她被认为总是从“右”的一边看事情，叫做“一贯右倾”。她未免为此感到苦恼和迷惘，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她总觉得自己“右”得并不错。

1958年，克林负责报纸研究组的工作。这时候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人民日报》也昏昏然跟着大讲疯话、胡话。秋收前后，她到河北元氏县农村住了几天，看到红薯烂到地里，豆子崩在土中，农民丢下成熟的庄稼去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却是一堆炉渣似的所谓“烧结铁”，甚至连“烧结铁”也不是，只是一堆炉渣。面对现实，她从迷惑中清醒，深深地忧虑起来。想到报纸上还天天在为“小土群”大炼钢铁放出的“卫星”大唱赞歌，她拣了一块“烧结铁”带回编辑部，让大家看看炼出的都是什么。

1959年春天，她又带着一脑子疑虑到河南农村做调查。河南省是当时“五风”刮得最严重、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地方之一，有的农村已经饿死了人。克林从青年时期就做农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所生的两个女儿都是太行山农民的奶水哺育成人的，她和农民血肉相连。听说农村饿死了人，她忧心如焚。凭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和良知，由着她说话直言快语从不拐弯抹角的性格，向编辑部如实反映了农村里令人揪心的情况。

秋天，从庐山刮起的“反右倾”运动的风暴来了。她的这两次汇报，还有她带回的那块所谓“烧结铁”，成了她“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铁证”。她被定为报社“反右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挨了几个月批，做了几个月检查，背上个“严重右倾”的罪名。可她还是没有想通：为什么不许讲真话，不许讲道理？不是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吗，为什么做了调查的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的却有发言权，还要批做了调查的？为什么不能讲实际存在的缺点，讲了就是抹黑？……她为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党“不合拍”而

深深痛苦不安。

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党总结了这几年的左倾错误，“反右倾”的结论也甄别平反了，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候，几年左倾错误造成的席卷神州大地的三年大饥荒已经夺去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克林这时候是群众工作部副主任，接触到大批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来信。她被感动了，不管别人说她是不是又“站在右边看问题”，她主持选编了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希望农民能从这里找到一条活路。不料，仅仅几个月，风向又猛向“左”转，最高领导发出了反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指令，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被压下去了，包产成为禁区。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她被说成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多次被批斗。

## 几年无奈，长期歉疚

宣传农业学大寨的那些年，大概是克林几十年从事农村宣传中，最为恼火的时光。

大约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克林以刚刚被“解放”的干部身份，被指派到当时的“文革部”农村组负责宣传农业学大寨，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比她稍晚一段来到农村组，深切地感到挑这副担子对她是太沉重太痛苦了。这时候的学大寨运动，包括大寨本身，都越来越远地背离了周恩来总理总结的大寨的三条基本经验，根据“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需要，制造出一条又一条“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严重祸国殃民的口号。当时大家对学大寨这一套虽然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但也感觉到不少问题：大寨领导人作风霸道；到大寨采访不自由，甚至连大寨农民的家也不能随便进；大寨、昔阳的有些经验有虚假的成分；以及无休止的“大批大斗”等等。这些，我们从大寨回来，都和她一起悄悄议论。实际上，以她对农村的了解，她心里比我们更清楚。她对当时常驻大寨采访的段存章同志说，前几年她曾去过左权，抗战时期她女儿就“奶”在那里。在

县里,干部向她说的是这里生产发展、老百姓生活改善的一些好听话。她去看望女儿的奶娘,奶娘向她诉苦,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曾驻在这里)对农民的疾苦,她比我们体会得更深,却不能不坐在那里发“堵路、割尾巴”的稿子,真是无奈啊!

有一段,江青炮制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小靳庄经验,一时间唱文革歌、跳忠字舞、写口号诗成风,学大寨运动又添了一项新内容,各级干部又多了一个“朝圣”的地方,连北京一些机关干部也去“学习参观”。克林作为《人民日报》负责农村宣传的,却迟迟不动。好心的同志提醒她该去小靳庄看看了,不然会被说是态度问题。她接受劝告去了一趟,回来却一言不发。当时也在农村组的郝洁同志悄悄问她小靳庄到底怎么样,她冷冷地说:“唱歌跳舞能多打粮食?”

以后谈起这一段难过的日子,她实话实说:当时不跟着犯错误不大可能,力争少犯也很不容易。因为总的“舆论导向”是报社的人无法逆转的。她所能做的就只是同新华社的同志们合作,力争少宣传那些明显违反“文革”前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几次调整后中央明文规定的政策的那些极左的做法。起初,还找人写一些强调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评论,送审的时候被“枪毙”了。她当然也莫可奈何。直到离休,甚至重病在身以后,她还常常念叨这一段“堵路、割尾巴”的宣传,愤愤然说:“农民的日子够苦了,还不许人家搞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每一谈及,激愤之中包含着深深的歉疚。

到了80年代,学大寨运动已经烟消云散,大寨在人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淡漠了,虎头山上已从昔日的参观者人流不断变得冷冷清清。1985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了一篇标题醒目的大文章:《今日大寨》,作者李克林。离休已经几年的老大姐,以古稀之年重登虎头山,在大寨走村串户,和大娘、大嫂们在炕头亲切谈心,和新老干部坦诚地交流思想,然后热情洋溢而又实事求是地把一个从极左思潮控制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真实的大寨呈现给读者,最后还为大寨人说了公道话。谈到大寨当年的

农业丰收,她说:“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在大寨老模范贾进才和宋立英老夫妻家的炕头上,两位老太太亲切地谈着心里话。宋立英说:“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什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李老太说,宋立英的话是对当时这段历史简明而又实在的概括,“我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贾进才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

写出了这篇通讯,多少年来郁结在老太太心头的大寨情结应该可以解开了。

## 最舒畅的时期也免不了抗争

从事农村宣传几十年,让李老太心情最为舒畅的,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阶段。这已是她年过花甲,坚持在《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岗位上的最后几个年头。

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以后,作为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的克林,在还不得不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同时,就紧紧抓住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个主题,从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种植自留地,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方面,组织报道,撰写评论。这些方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实实在在为农民争得的一点自由,谋得的一点利益。可就是这样一些报道,也仍然遇到不小的阻力,不断受到当时主管农业、主管宣传的一些领导人和某些地方的头头们的批评、指责和阻挠。我们发表了关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文章以后,当时还坐在副总理位置上的陈永贵立即批评:“这些年农民是拉着推着才走向社会主义的,叫他们自主,他们会自主到哪里?”我们在报道中强调发展家畜副业,一位省委书记就批评说:“靠老太太养鸡能养出社会主义?”幸好当时报社的领导同志是思想解放,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但是,作为直接担当责任的农村部主任,李老太顶着的压力确实不小。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在王府井报社编辑部五层楼上的礼堂,她在讲坛上传达当时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对《人民日报》

农村宣传的批评的时候，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一句接受批评的表态也没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气呼呼地走下讲台，还在嘟嘟囔囔，显然是仍然坚持着不同的意见，不能接受无理的批评。只是限于纪律，不便公开表达。

面对阻力和压力，克林不免气愤，却从不退缩，总是精神振奋，思想活跃，倾注全部心血于肃清极左流毒的宣传报道之中，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无奈和苦恼。又一次，送了一篇《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经济政策》的社论稿给当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审查，纪说：关于农村政策，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社论缓缓再说。社论一时发不出去，她不罢休，就用“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布置了一系列有关落实政策的评论，在报社领导人的支持下，绕过送审的程序发表出来。当时，只顾鼓吹大干而不顾农民死活、不考虑农民负担能力、不讲政策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作为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两大典型之一的山东“邹西会战”中，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推广“邹西会战”经验的大会上，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人讲话，强调的只是大干快上，规模声势，要求农民“吃大苦，流大汗，不惜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听到这样的话，国家农业部的一位同志悄悄地对记者说：中央领导人这样一发话，下边干起来就难免死人啊！“大跃进”的教训记忆犹新！会后，克林置这位领导人的要求于不顾，坚持实事求是，组织力量，明确思想，在如实报道“邹西会战”的规模和成绩的同时，突出地强调了政策问题。她带领报社农村部的同志，会同报社、新华社驻山东记者，撰写了一系列述评，评论“邹西会战”中种种违反政策的现象，尖锐地批评了用“大干”破坏政策的做法和谬论，诸如“要大干就不能怕农民负担过重”，“要大干就不能不平调”，“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等等。这样唯实不唯上，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第一版上，以超大黑体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为标题，用大半个版的篇幅登载了两件读者来信和长长的官气逼人的按语。主要的来信者署名张浩，在西北工作，来信说的是他回家乡洛阳农村，看到那里在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中间，出现了把土地、牲口、农具分到作业组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作业组就像一级核算单位，削弱和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另一来信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按语的气势非同小可，大意是说只能实行“包工到组”的田间管理办法，这与“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已经实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报社农村部的同志们，包括克林在内，早晨上班后一看报，愣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报上发表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我们部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语气显然



李克林 1994年在庐山。左为郝洁，右为宋璋

是要“纠偏”。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联产计酬作为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才过了两三个月,难道中央的指导思想就又变了?克林去问报社领导人,得知由报社总编室直接发表的这组稿子果然是“有来头”的。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人给报社发来一封指示信,大意是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闹分队现象,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要《人民日报》赶快发表纠正这种现象的言论,引起注意。据说,这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14日总编室接到这封信,认为时间紧迫,就由夜班编辑选了两件来信,根据上边发来的指示信的精神写了按语。因为是“上边”的指示,值班的副总编辑也就只好同意见报。实际上,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与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并不“完全是两回事”,不划分田地和必要的牲口农具给作业组,各组怎样包工联产计酬呢?这时候,克林正在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座谈会,这天的《人民日报》一到,会场哗然。有人质问克林: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她如实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社也有责任。这一天的报纸到了各地,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和混乱。大批来信纷纷质问:是中央政策变了,还是报纸错了?新华社的“内参”也连续反映这一天的报纸引起的混乱和对《人民日报》的意见。《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批判极左中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怎么在春耕大忙季节,在农村正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关键时刻,兜头给农民大泼冷水呢?克林十分恼火,一谈起这件事情就激动不已。她不再像宣传“农业学大寨”时候那样无奈,而是向领导上如实反映情况,据理力争,要求在报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澄清思想,稳定局面。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再选两封读者来信,加上编者按语,正确地阐明联产计酬的政策。这个建议送到中央“农口”,当时的领导人却不同意,要报社选两件意见对立的来信同时发表,免得“显出倾向性”。编辑部只好照办。克林对此当然不满,说这是“糊涂的补救”。“糊涂的补救”总比不补救好一些。就这样,也是克林和大家力争才得到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又发生这样的波折,使她更加感到“唯实”的不易,纠左的艰难。直到后来卧病在床,她还常常与我们念叨这件事情。

## 唯实,需要勇气

从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超高速完成以来,包产到户就是农村问题的禁区,多少人为此挨批挨斗,甚至劳改坐牢,家破人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政策是逐步放开的。开始,允许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却不准包产到户。从不准到肯定包产到户,经历了三年。三年中,农民的实践在前,中央在政策上给以肯定加以完善在后。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政策的放开,根源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靠报纸反映、传播。在这中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发挥了特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很少有的。实际上,这正是真正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这过程中,作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克林表现出了她的勇气和坚定。

在中央红头文件上还规定着不准包产到户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农民就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自动实行了包产到户和类似的办法。结果是生产发展、农民高兴,而且势如燎原。很快又突破了文件上仅限贫困和偏僻山区才能实行的规定。许多记者、通讯员接近实际,更真切地听到农民的呼声。反映这一真正的农民运动的稿件送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问题尖锐地摆在李老太面前:是死抠着文件条文对现实闭眼不看、掩耳不闻,还是勇于面对、如实报道?她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我们的报纸上,宣传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的同时,突出地报道了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状况。这些通讯和述评反映和赞美了包产到户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的喜悦,也涉及由此而引起的斗争。这些文章热情洋溢、材料翔实,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加以在版面上放在突出地位,在当时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于阻挠改革的极左思潮的流毒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也正因此,它所激起的反对声浪也是十分强烈的。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大方向有问题”,这样强调包产到户,会动摇集体经济。有人批评:中央提倡多种责任制,《人民日报》却突出一种。有人提出:中

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包产到户或不能普遍实行,《人民日报》却大肆宣传,违背了中央的决定……这些责难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当时中央负责宣传工作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少数同志。就是在我们报社农村部内,也有不一致的看法。当时我虽然赞成包产到户,但作为中央党报的一个老编辑,对于在公开宣传上突破中央文件的规定,却是心有疑虑的。有类似看法的可能不只我一人。但是对于合乎农民群众利益的事情,李老太却从不动摇。她向我们说明,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思想解放,报纸应该如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新的实践和要求。

在支持农民争得生产和经营上的自由这一斗争中,她为什么能够这样义无反顾坚定不移?这里可以用她自己以后的一段话说明: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历来存在着“唯上”和“唯实”的矛盾。只知“唯上”,不敢“唯实”,盲目紧跟,不顾群众,曾使我们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怎能不记取这惨痛的教训?今天改革更深入,情况更复杂,形势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实际,敢于唯实,敢于为人民讲真话,说实话。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

我常想,三中全会后,大家都知道应该“唯实”而不“唯上”,可是并不是每个人自认为的“实”就是真的“实”。而且,认识到了什么是“实”,又不一定能坚持这个“实”。李老太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惨痛教训,和农民的血肉联系使她把握住了农村的真正的“实”,几十年的坎坎坷坷,又使她敢于不计个人得失,坚持这个“实”。

李老太常常自贬:我这人事务主义,忙忙碌碌,没写出多少好文章。我们且不说她离休以后下乡调查,写出了多篇有广泛影响的好通讯,她在职期间,有时候我想她是有意不写或少写文章,因为她没法说真话;

至于最舒心的几年,她确实没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写文章上,而是成天忙于广泛联系了大批驻各地跑农村的记者,和更多的农村通讯员,当然也包括几位资深的名记者。大家都亲切地尊称她为李老太。他们一到报社,就直奔李老太的办公室,李老太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谈情况,帮他们出主意、定题目、改稿子、配评论。她为他们服务,又从他们那里触摸农民的脉搏。她还经常关注办公室里的“大麻袋”(通讯员的大批所谓“自流来稿”的归宿地),不嫌麻烦地去沙里淘金,总想从里面听到一点直接来自基层的声音。她的这种“事务主义”不仅使肃清极左流毒的报道能够生动活泼,贴近现实生活,说了不少农民憋在心的话,而且支撑了她对“实”的把握,增加了她敢于“唯实”的信心。

克林在病重的最后几年有一个遗憾:她参加了农村大转折那几年中央召开的历次农村工作会议,自始至终旁听和采访了规划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的过程。她认真地思考酝酿,要把自己在那些会上和会下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写出来。当她已经不能行动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她还用哆哆嗦嗦的手翻阅那些笔记本。疾病终于完全剥夺了她工作的能力,她没法写出她想写、我们想看的这篇文章。但是,克林大姐,你不必遗憾,作为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在农村改革的大转折时期,在为农民争自由的斗争中,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可以无愧地回归大自然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 通告

2003年合订本于2004年1月装订完毕,如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我社发行部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3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 英若诚：从艺从政皆本色

● 张俊杰

2003年12月27日,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因为一个老人的离去,这个日子将长久留在中国戏剧人的记忆里。这个老人叫英若诚,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艺术造诣,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独树一帜。

## 众多角色中 偏爱“刘四爷”

英若诚从艺50余年,表演艺术蜚声国际,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的舞台、银幕和屏幕上的人物形象。如话剧《雷雨》中的鲁贵,电影《白求恩大夫》中的董翻译,《知音》中的袁世凯,电视剧《围城》中的高校长,《末代皇帝》中管教所所长等。有人说,英先生扮演过的诸多角色,演得最好的是《茶馆》中的刘麻子。也有人说,《骆驼祥子》的刘四爷是英先生表演艺术的顶峰。还有人说,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外国人都认可,美国人还给颁奖了,为中国人争光了。又有说,最细最难的要属《推销员之死》中的主角威利·洛曼……在扮演过的众多角色中,英若

诚先生本人更偏爱话剧《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觉得这个角色分明是自己四爷爷的原型,连他母亲看过演出后,也感慨地说:“四爹又活了。”英先生对这个角色太熟悉了,所以往那儿一站就是他了,可以说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体会一种“角色的自我感觉”。著名戏剧活动家黄宗江先生曾经这样说过:“看戏的有捧梅兰芳的,有捧肖长华的,我觉得英若诚演刘四爷最好,脖梗子上都是戏。”

## 一生最爱吴世良

英若诚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的芳心,这个名叫吴世良的女孩最终成为他一生的伴侣。他俩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吴世良精通英文,熟悉几国语言,1975年美国著名记者苏兹内格来华访问时,她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她待人热情,为人豁达。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这样评价吴世良:“她从不诉苦,从不怨天尤人。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博大的历史感,使她坚定自若,不被生活的拨弄所左右,

赋予她一种独特的高尚的气质。”在英若诚眼里,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性格很坚强,对困难从不畏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分别关在两个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彼此杳无音信。而既为人妻,又为人母的吴世良独自挺了过来。虽然她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但英老一直爱恋着她。她的巨幅油画画像始终挂在英老家最显眼的位置,寄托着思念和眷恋。

## 积极推动 文艺改革、创新

1986年至1990年,英老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在他所分管的艺术生产、艺术教育和文化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文汇报》著名资深记者唐斯复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988年夏季的一天,她遇到陪同泰国王储来上海的英若诚副部长,提出了想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上海演出的想法。当时,若诚沉默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好,我支持。”回北京后,很快北京人艺就打来电话。1988



年秋末冬初，若诚同志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台大戏赴沪有偿的商业性演出，大获成功，开辟了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商演的先河。

1987年中国举办第一届艺术节，英老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艺术也需要改革开放，作为我国艺术事业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中国艺术节，一方面是文艺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将极大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文艺体制的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艺术节。同以往的“会演”、“调演”、“比赛”、“评奖”不同，不搞名目繁多的各类评奖，最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一下子都能被人认识的，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其例。同时好的作品要接受检验，这很重要，要有群众的口碑。他说，办艺术节就是对艺术漠视群众的观念的一种冲击。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要力求面向群众，避免把艺术节目送到北京作为最高成就，看作首要任务，单纯为评奖而评奖，为调演而调演，这个倾向是危险的。国际上凡是办的成功的有影响力的艺术节，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广泛的群众性。同时他还说，艺术节是对艺术家、对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尊重，举办艺术节，向人民展示一下艺术成就，有利于提高艺术事业的地位，希望全社会对文化艺术事业能更支

持、关心、尊重。文艺和教育一样，是社会的基础工程，我们国家的民族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我们有责任使它发扬光大，为世界艺术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在第五届艺术节上，他在观看了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百花赞》彩排后，记者采访时，他说：“这台晚会不错，有创新。艺术就是要新，如果不新，要你干嘛？因为，诗词歌赋，从古到今，浩如烟海，堆积如山，所以，一定要新。当然，新的当中，还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因为，不是说新就一定好，但要提倡新。”他认为，艺术节开幕式的演出，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的震撼力和冲击力，要能充分展示一段时期内我国文化艺术制高点的风景。

### 钟情于莎士比亚

英若诚博古通今，走进英

老的书房，如同进了书的海洋，四壁从顶到底的书柜放满了码放整齐的书藉，世界名著、线装古籍，经典剧本，各类工具书等。经版本最多的当属莎士比亚作品了，这自然少不了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这是本装潢考究的、酱红色皮制封面英文版精装书，据说此书在全世界只出版了500本。在无数次记者请教关于莎翁剧作或关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时，英先生总会用他那特有的宏亮而又宽厚的嗓音，富有情感地朗诵出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他认为：“这段独白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跟生死这个巨大的命题有关。有人类以来，人就是有生死的。不管活多长时间，人最终还得死，这是自然法则。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好，宗教问题也好，最终都得归结到这个基本问题上来。这段独白



英若诚在书房

不是简单的只讲人生的生和死,是在说人生的决定,讲的是怎么拿主意。be 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存,nobler 是指勇气,理论上的勇气。莎翁的哈姆雷特多年来被人们误解,说只不过写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其实不是,莎士比亚是考虑了许多精神世界和宗教方面的东西。作为作家能够考虑这些,总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这部戏之所以经典,可以说是要有什么,阴谋、毒杀、篡位、夺爱、复仇、恋爱、喜剧、悲剧……《哈姆雷特》是莎翁的最高成就。2002 年病重的英老又重新翻译了《哈姆雷特》,他认为,“这部戏是戏剧史上有数的几个最深刻的戏剧之一。

世界各国都会有各民族自豪的东西,像法国的莫里哀,俄国的契诃夫……但是,莎翁能够把哈姆雷特用他独特的笔触写出来,翻译的时候,常常让人拍案叫绝,那是字字珠玑啊!”

## 译林中开拓

英老 50 多年一直坚持搞戏剧翻译,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20 出头的他,就开始翻译苏联表演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两年后,英先生将近 30 万字的译本交给导演焦菊隐先生指正。一天,焦先生告诉他:“你的译著,我请巴金先生看过,他很

满意,愿意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作品能得到巴老的赏识,并帮他出书,英先生兴奋极了。1954 年 7 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至今仍是表演艺术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翻译了世界十几位名家剧作,发表过 200 多万字的话剧剧本及理论著作。这其中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菲尔汀,挪威的比昂逊,爱尔兰的奥凯西,印度的泰戈尔等,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世界名人及他们的名著;也包括将中国的老舍、曹禺等人的巨作译成英文,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文化艺术。他的英文非常标准、地道、流利,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了如指掌。可以说,英先生的作品翻译也同样具有独到之处:其一,将经典的话剧剧本作为翻译的主攻方向。将世界多部名剧译成中文,在中国舞台上演出,如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等,把中国的名剧介绍给世界,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其二,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语言对观众的直接效果,力求译文既忠实原著,又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使每个角色的语言都各具特点,收到了良好的舞台效果。《推销员之死》描写二战后的美国社会,语言以纽约布鲁克林的方言为基础,为了表现这一语言特色,英先生经过细心揣摩,决定使用北京天桥一带方言的某些语汇,赋予译文以原作的风韵。所以他本人认为自己翻译的诸多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推销员之死》这个本子。其三,在选择剧本方面始终坚持把世界优秀剧目搬上中国舞台的原则,充分显示出他的胆识与见地、欣赏与品



《推销员之死》剧照

味。1988年《哗变》的上演就是如此。英先生曾说：选择《哗变》的初衷，就是因为它推翻戏剧的一切规律，全戏没有富于变幻的场景，没有鲜艳华丽的服装，没有梦幻变化的灯光，没有优美动听的音乐，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和缠绵浪漫的爱情，甚至没有一个女人。整个戏只有四个人物出场，讲述的是美国军事法庭上的一次审判过程。当时，人艺剧院有不少同志为之担心，害怕观众不接受。面对挑战，英老成功了。连演70场，场场爆满。一位观众讲：“在《哗变》中，‘话’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话’还是话剧之本。”曾有艺术界权威人士称：中国话剧90年历史中经过“两度西潮”，即20年代和80年代。80年代的“西潮”英先生功不可没。

## 心中总有老百姓

英老是非常重感情的人，

对部下、对同事、对朋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曾给他开了六七年车的王威群，因患胆结石，不能给他开车了。他于是经常向身边的人打听，小王的病怎么样了？还疼不疼？并让他们转告小王，少吃油性食品。1998年我随英老到四川出差，正直周末，成都的一位朋友邀请英老到当地有特色的火锅店吃饭。我们刚下车，就见饭店前热闹非凡，原来是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认出了英老，窃窃私语。年青的说，这是英达的父亲。有的说，是演《围城》里的高松年。年长的说，是《茶馆》中的刘大麻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认出来了。这对新人小心、拘谨地挤到英老面前，请求英老与他们合影留念，英老面带微笑，点头接受。于是，闪光灯下，英老和这对身着中式结婚礼服的青年人合影。大家熟悉了，气氛热烈了，当我们坐下吃饭时，这对新人又特意

来到我们桌前给英老敬酒。英老因身体原因，以茶代酒，祝愿这对新人百年合好，幸福美满。

英老去世的第三天，一位曾在英老分管的司局工作的同事含着眼泪说：“我收到英副部长寄给我的贺年卡了，同时也惊悉他已经走了。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真的走了？……”每年英老都要给曾同他工作过的同事、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送贺卡，今年也不例外。本来因为重病在身，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困难了，身边的人劝他说今年就算了，等病好了，明年再给大家送。他却坚持一定要送。12月中旬开始，他就坚持每天写几张，等写完最后一张，还让工作人员检查字写得行不行，是否都送出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批贺年卡，竟是永久的纪念，是英老用自己的身心给予大家的最后祝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读者来信

《炎黄春秋》编辑部：贵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出版档案揭示的〈红岩〉问世波折》一文，以大量史料澄清了有关小说《红岩》出版经过的一些误传，是很可贵的。不过，由于多年来关于《红岩》创作经过有过不少讹传，该文也未能避免沿用了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即文章开头提到杨益言时，称之为“大屠杀幸存者”，并说他“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时“又碰到了同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刘德彬和罗广斌”，这是不确的。刘德

彬和罗广斌确是大屠杀幸存者，但杨益言不是。他是在1949年4月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在重庆市警察局的堂兄花钱活动放出来的。这时离“一一·二七”大屠杀还有半年时间。而且，他与刘德彬、罗广斌被捕时的情况也不同，刘、罗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杨益言被捕时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共外围组织或民主党派成员。正因为如此，解放初期他并无资格参加“烈士追悼会筹备工作”，当时烈士追悼会筹备工作是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和原川东地下党领导成员一起参与的，那时中共地下组织还未公开，原地下党成员还需经过审查，刘德彬、罗广斌都还未能恢复党组织生活，所以就连他们也还只能是协助筹备工作，向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供烈士资料。

读者 孟 樵

# 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

● 叶正大

1951年春天，我们接到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李鹏同志的通知，说国内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我们在苏联的留学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国参观学习。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个大喜讯。

我们是1948年底从哈尔滨出国来到苏联学习的，当时苏联政府还和国民党政府有关系，我们不能留在莫斯科，联共党中央把我们一行21人安置到距莫斯科市大约有300公里的依凡诺和市的国际儿童院去学习俄文。有一天，听说院方要处理一批中国同志留在国际儿童院的遗物。我们几个人商量，觉得这些遗物

当中皮箱、衣服等都可以处理，但证件、书信等很重要，得找一下，如将来有机会可退交给本人或其亲属。经过一番查找，我发现了三件东西：一张邓颖超妈妈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出席证，证上有邓妈妈的相片、名字；一个中央苏区的银元；一张苏区的土布上用油印机印制的一角钱票。这些都是我国有历史价值的国宝。正因为这引出下面一段历史对话。

1951年6月份我们回国后，首先把苏区的银元和土布票子上交给历史博物馆，他们接到这两件国宝非常高兴。然后我给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周伯伯和邓妈妈，我有事情想拜访他们。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我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如期到了周总理的家。开始周伯伯问我们学习的情况和莫斯科的供应情况，



叶挺

因为当时苏联才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国内食品供应是很困难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运来的是石油，运回的是土豆和粮食。我突然想起邓妈妈的“六大”出席证，就急不可待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我向邓妈妈详细讲了我们在国际儿童院找到它的情况，邓妈妈和周伯伯看到出席证都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谢谢你们把它带回来给我们！”邓妈妈接着还谈了一些“六大”开会的情况。

在吃饭的时候，周伯伯问到我们家里的情况。周伯伯的记忆特别好，前一年（1950年）

在莫斯科和苏联谈判时有一段时间我曾当过总理的翻译，空闲时我曾经告诉总理我外婆和三个弟妹住在广州。当时周伯伯突然问我外婆生活怎样？身为一国总理，国内国外大事就够管的了，还记得我的外婆！接着周伯伯又问到在广州的几个弟妹的情况，周伯伯动情地说：“你爸英年早逝，牺牲时才50岁，你们要继承遗志，努力学习，坚持革命。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

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我非常佩服周伯伯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为了说明实际情况,这里再介绍几件事:

一(新华社延安1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黄晓庄同志及随员魏万吉同志、赵登俊同志、高琼同志(女)等13人,及美国驾驶员兰奇上尉 C.Elange、瓦伊斯上士 Dal-laswise、迈欧 M.S.Maier、马尔丁 E.R.Msdin 等4人,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原载1946年4月12日《解放日报》)。

二、我父亲出狱后十个小时就写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里我想把我父亲在五年监禁时,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陈诚几次说降不成,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开始的蒋介石召见我父亲说降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谈话只有三个人,蒋介石、郭忏(陈诚的帮手、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和我父亲。这次会见没有公开,我父亲事后整理了一份材料,我把材料直抄如下(为可读起见我把甲乙和一些代号直译了:蒋指的是蒋介石,叶指的是我父亲)。

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

蒋步入客厅频点头。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下。

蒋:身体还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

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

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对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个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部署不变动,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

叶:如果这样说,共产党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了!尔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叶回来还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以上是我父亲笔录的全文。依我看关键是三句话：蒋介石说：“……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应解读为：“这样我发动的皖南事变，是我错了么？”蒋介石关键的第二句话：“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我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是我父亲在《囚歌》中一句名言）。关键的第三句话是我父亲的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蒋介石当时有强大的政府，有以戴笠为首的的特务机构。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子都在蒋家特务掌握之中。现在你不但不跟我走，把你放出来第二天就重新加入共产党。命令特务在美国飞机上做点手脚，置你于死地，是蒋介石“顺理成章”的事。“四八”烈士证明了这点。其后刺杀杨虎城将军一家更证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

三、再让我们从航空技术和当时的天气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

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

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我手头上有一份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失事飞机现场，直到把烈士遗体护送到延安安全过程的干部顾逸之同志后来写的《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复印稿。我想把其中“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一章中有关几条节录如下：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

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周恩来总理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阴谋。参加清理失事现场的基层公安干部讲了四条失事情况，分析后说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破解这个谜吧！

（一）飞机是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

（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度，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而飞机在2000多公尺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

（三）在遗物中有一份有关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航向。

根据以上三个事实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

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来说,飞行员在自己随身的文件夹中,是应该带有标示着飞行任务航线的地图的。按照地图飞过黄河那么大的目标,是可以看见或者感觉得出来的。当时下面天气不好是一片云雾,地图上肯定有山的标高,高度表又失灵了,你发了迷航电报,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为什么不飞高点?这里可能有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的错

误,但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高度表破坏了。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很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型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全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就是普通说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后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记录仪)。和现代我们中国的客机比较,C-47是很原始的。因此,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飞机失灵。

以上是周伯伯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和我对它的认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接着谈第二个问题。

周伯伯说:“这件事情出来后,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能这样做呢?”

周伯伯说:“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

接着周伯伯讲第三个情况。

周伯伯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和美国



1946年4月19日,在重庆举行的悼念四八烈士的大会上,周恩来致词

人,并且主要的都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了。不能使国民党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以上是1951年6月份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家中谈论有关国民党特务陷害“四八”烈士的全部情况。按照国家保密法,30年后可以解密,现在已过了50多年,周总理对我的谈话内容应该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我家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我到苏联学习时,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更没有新中国的飞机。所以我下定决心,学飞机设计,回国后又为航空事业服务了几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并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孤岛。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比台湾空军强大几倍。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的国民党特务如果当时是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八九十岁了,在世界上也所剩无几了!但是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狗特务!”

(责任编辑 吴思)

#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

——读《姚文元同莫艾的五次谈话》和《五十次电话指示》

● 王忠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而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莫艾交出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有姚文元同他五次谈话记录和打给他的五十次电话记录。当年莫艾专案组将这两份记录印制成册,作为批判“四人帮”的材料。今天回头看这些材料,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出“四人帮”是怎样严密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

两份记录材料是可信的。莫艾是一位思想作风很细致的同志,多年的记者生涯,培养了他勤于作记录的习惯。据他讲,同姚文元的五次谈话,除了当场记录外,他回到报社后都作了追记和补记,“在字句上可能有出入,但大意精神是不会离谱的”。五次谈话地点,前三次在钓鱼台,后两次在姚文元住处按院胡同41号。每次谈话大约都是1-2个小时。

五十次电话,除姚文元直接“指示”外,有的是姚文元秘书打的,少数是姚文元嘱托《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向莫艾转达的。

莫艾1973年8月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社,在他主持光明日报社工作的三年中,上面直接领导他的就是姚文元。而这段时间正是“四人帮”作乱最猖獗的岁月。姚文元在控制舆论宣传大肆兜售其反党的极左路线方面表演得十分充分。下面从两个记录材料中摘取几个问题加以概述。

## 专刊刊头是名人题字的一律砍掉

《光明日报》在1949年创刊后的几年,先后办起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经济学》《文字改革》《文物与考古》等学术专刊和《东风》文艺副刊。这些专刊副刊是《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在学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除《文字改革》专刊在“文革”前已停办,其余专刊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相继停办。1973年莫艾同志主持《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计划逐步恢复这些专刊副刊。根据当时的情况还准备增办《知识青年》《自然科学》《卫生》等专页。在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后,姚文元批示同意,但是在几个专刊刊头题字上却卡了壳。

比如《文学》刊头题字。“文革”前文学方面专刊称《文学与遗产》,这次恢复拟改称《文学》。由编辑部邀请郭沫若同志书写了刊头。然而,在1975年8月21日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中却说了一些贬斥郭老的话:

《文学》刊头题词,是郭沫若写的吗?《文物与考古》《文字改革》都是他写的?都是他写不好,其它专刊是否也都要他写?为什么不用鲁迅的字?评《水浒》鲁迅是正确的。郭沫若有成就,我们党尊重他,但当年攻击鲁迅的是创造社。我就担心你们那里有些旧人,(同社会上一些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已经写了,怎么回复他呢?就说还有几个专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写,将来统一考虑。现在就用普通字吧!

为了一个刊头字问题,用得着把30年代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翻腾出来吗?这件事给编辑部



造成很大被动,只好向郭老婉言解释,还不能露出姚文元的话。

在《文学》刊头题字上姚文元抬鲁迅贬郭沫若,那么他真的是尊重鲁迅吗?请看他对采用鲁迅手迹的《哲学》刊头,又是怎样说的:

哲字不好看,下面的口字太敞。鲁迅写的是小楷,放大了就不好看。既然选就选好看一些的,另外换一个。

他这样说了,报社不能违抗,最后《哲学》刊头改用了美术字。

《文字改革》专刊1953年3月创刊,是请周恩来总理写的刊头。还在莫艾尚未调到光明日报社的1973年5月,毛主席根据光明日报社的报告即已批准《文字改革》专刊复刊。它是“文革”中第一个复刊的专刊。刊头仍用周恩来总理的题字。然而1975年9月姚文元同莫艾谈话,却别有用心地问《文字改革》刊头题字是谁写的?总理的手迹,一般人都会看出,难道他认不出?等莫艾向他说明是总理手迹时,他沉着脸默不作声。然后说,等将来各专刊出齐后,可以统筹研究一次。

## 独霸艺坛,扼杀电影《创业》

《创业》反映了大庆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在1975年文艺舞台作品极少的那个历史背景下,有这么一部影片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可是,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否定和挞伐。

1975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赞《创业》的文章,江青读后,很不满意,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今天《人民日报》用极大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对《创业》电影(要)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评论权利我们不能放弃。”

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姚文元,接到江青指示,马上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这类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

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江青不满意《创业》,文化部(当时称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人,顺着江青的意图,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创业》定了10条罪名。什么有意给刘少奇、薄一波涂脂抹粉啦;什么许多警句是余秋里的语言啦;什么技术语言太多、结构拖沓啦等等。影片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对文化部批评不服,给邓小平、毛泽东写了信。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江青等“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批示拼命反抗。8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文化部的几个人,在钓鱼台开会,商讨抵消毛泽东批示的对策。江青在会上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还没有看《创业》电影……主席说‘无大错’,就是说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张春桥也用同样语言附和江青。他们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歪曲和抵制主席的批示。

8月21日,姚文元约莫艾谈话,他学着江青的口吻说:“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无大错并非十全十美。在评论此片时,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点、错误也评成好的。你们送来的《创业》那个版,来信说还准备再发两三个版,我看发一个版也可以了。副题赞《创业》,可改为评《创业》。照片三张有一两张也就可以



电影《创业》剧照

了。群众在看影片,照片不一定太多。”

针对送审文章中,有“不要求全责备”的话,姚文元说:“不要求全责备,是对领导说的,编辑要掌握这个精神,不必写在文章里。”

这里还要说一下,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中有“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话,这句话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就在毛主席对《创业》批示这个1975年7月份,还有两次谈到要调整党内文艺政策。一次是同邓小平同志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另一次是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也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舞台冷冷清清。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而样板戏的成就都写在江青的功劳簿上。江青独霸艺坛,不允许别人有作品出现,出现了就加以围攻。在《创业》影片受压制之前,还有《园丁之歌》《海霞》两部电影也遭到《创业》一样的厄运。比如湘剧《园丁之歌》,是歌颂小学教师劳动的影片,1974年11月,毛主席在长沙看过,鼓过掌,说是一出好戏。可是“四人帮”横加指责,说什么剧名就不对,教师不能称园丁,园丁只能是共产党。还说什么宣扬了师道尊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等等。

“四人帮”这些言行,毛泽东1975年已有发觉,所以在一个月内三次谈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 仇视老革命压制长征宣传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975年10月是长征胜利40周年。9月,中央决定作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光明日报》为此作了宣传计划呈报姚文元,但姚文元迟迟不批。10月10日以后,姚文元又频频指示,半个月时间竟达4次之多。

10月10日,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给莫艾:

你给文元同志写了个报告,关于《万水千山》的。文元同志有个复示给我们,让转告你们。这次宣传总的精神,是宣传长征本身,《万水千山》这出戏,我们(指《人民日报》)原拟出画刊,现在决定不出了。将来发剧评时,配点照片就行了。

莫问:听说总政还有不少稿件要发表,不是说要开会给各报分配吗?

鲁答:会已经开过了。

莫问:你们准备登几篇?

鲁答:精神是掌握紧一点。文元同志说,你们那个报告不另批了,嘱转告你们,你们心中有数好了。

《万水千山》话剧,是出长征戏。这次准备上演的是修改过的剧本。过去在长征宣传中对二、四方面军宣传较少,新剧本增加了这方面内容,本应好好宣传,却遭姚文元的压制。

1975年10月17日,姚文元秘书又给莫艾来电话:

你们送来的准备19日刊登的那幅油画《走向胜利》,文元同志看过了,他说:记得新华社关于19日的报纸版面已作安排,是斯诺拍摄的主席像和长征诗,可按新华社的照片刊登。送来的油画,作者和创作情况不了解,你们就按新华社的安排办吧!

《光明日报》计划在10月19日这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登油画《走向胜利》,据莫艾揭发姚文元的材料,这张油画的画面,毛主席身旁有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它是撷取长征路上的一个镜头。因为有总司令和总理,姚文元以不了解作者情况为借口予以“枪毙”。

1975年10月23日,长征宣传的第3次电话,这次电话是姚文元直接打来的:

长征40周年的宣传,你们可以和《人民日报》商量办。你们上次送来的报告,我没有批,这次的报告也不批了。总之,你们按中央批给总政的那个报告精神办。我记得中央批总政的报告是今年比往年的纪念规模可以略为扩大些。中央只审查了刘伯承的回忆录,是经过中央好多同志共同审查的。你们登的那些我都没有看,我不发表

意见。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宣传长征本身。你们斟酌办吧,我不批了。

听话听音,他这么一说,《光明日报》怎敢多发表纪念文章。原计划评论话剧《万水千山》和《长征组歌》的稿件被大大压缩。姚文元此人,做事颇工心计,送给他的报告,他经常说:“我不看了,保持评论权”;“我不批了,你们自己斟酌办吧!”这样,他就可以不露声色地、不留痕迹地否定他不满意的文章。

## 抓旗帜歪评《水浒》

1975年,从4月到8月这四五个月,是“四人帮”的日子比较难过的一段时间。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懂马列。自以为懂了,实际不懂。

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当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面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连续批评“四人帮”,使“四人帮”很被动。姚文元给莫艾电话也少了,平常一个月二三次电话,4、5两个月一共只来两次电话。

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读书发生困难。1975年5月,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调了一位中文系教师芦荻,作毛泽东的侍读,毛泽东同芦荻经常谈论古典文学。1975年8月13日,芦荻请教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毛泽东便谈了下面这一段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

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

芦荻将毛泽东这段话整理出来,第二天,8月14日,姚文元得到这段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以批评《海瑞罢官》起家而平步青云的这个大文痞颇有一点灵性,“这是多么好借题发挥的转机啊!”3个小时后,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呈上一份报告,说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报告并提议将毛主席的谈话,同他写给主席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撰写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要订出宣传计划。毛泽东看到姚文元信后,立即批示“同意”。

这样,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姚文元抓住毛泽东评《水浒》这面旗子,想为“四人帮”几个月来的被动处境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姚文元得意之余,抓起电话,打给《光明日报》莫艾:

有两件事告诉你们。主席有个重要批示,是给政治局的,我已告诉增发《光明日报》,你们明天就可以收到,你们接到这个报告后,要认真学习,认真讨论。批判关于《水浒传》的,是批判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它和传统的文艺观点相反。

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在评《水浒》问题上,又给莫艾作了四次指示。8月19日电话:

你们送来的规划,我已报送主席。我给主席的报告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供参阅,拟同意他们先这样办,遇到问题再商议。”主席批示同意。所以你们可以按照计划做起来。我打电话给你们,

是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8月21日，姚文元召见莫艾说：“现在又抓《水浒》，又抓《创业》，谁先谁后，我想还是把评《水浒》放在前头。”9月4日电话说：“除了《文学》专刊继续对《水浒》评论外，别的评《水浒》文章要专登。”

在姚文元授意下，8月23日，《文学》专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的文章，这早于《红旗》、《人民日报》评《水浒》文章5天到8天。

## 总理逝世不准悼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9日一上班，新华社给《光明日报》打来电话，转达姚文元的指示：

国内干部、群众悼念总理逝世的报道，请示了文元同志，文元同志的意见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若组织反映，仍应请示中央。

1月14日，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文章，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连日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文章登出后，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报社内部同志对此也感到困惑，有人问总编辑莫艾，为什么作这样报道？莫艾一语道破：“这是符合上边精神的”。

1976年清明节期间，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通过怀念周总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四人帮”的运动。“四人帮”一伙极为恐惧。这期间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鲁瑛对《光明日报》频频作指示。

4月1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咐转告：中央开了会。前门有送花圈，致悼词等活动，举行扫墓仪式，悼念总理。中央决定不搞这个。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指示。还是要批邓，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央机关要保证所属职工不参与这些活动，要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和布置。

姚文元说“中央开了会”，实际是“四人帮”一

伙人的会议。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姚文元住处查抄若干本“札记”，在4月1日“札记”中有这样记载：“昨晚开六人紧急会议”，根据札记的记载，这次会议内容是研究各地出现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形势及将要采取的对策。此处姚文元把它说成中央会议。

4月4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咐：天安门英雄纪念碑事件，是反革命性质。也有些人受蒙蔽，怀念总理，其中有反革命。注意两点：1)抓紧批邓；2)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要继续讨论英雄纪念碑事件的性质。弄清这个问题。听到谣言要追查……

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姚文元是始作俑者。在姚文元“札记”的4月5日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晨开会，我提出此事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行动。”姚文元自己作了表白。

姚文元上述几次电话指示，既决定《光明日报》当时宣传的立场、口径，也决定了《光明日报》机关内部政治工作内容。报社层层开会，禁止到天安门，并追查谁去过天安门。

粉碎“四人帮”后，莫艾被审查，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

三年来同他（指姚文元）五次谈话的接触和一些文件、电话、审稿方面的往还，也确实感到一些问题，突出的印象是他不大正派……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同志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不那么尊重，对老一代的人有点蔑视。

## 控制公开宣传的背后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致看出姚文元是如何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然而姚文元懂得，若使舆论宣传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还必须强化从思想上组织上的控制，把报社机关工作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灌输他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姚文元同莫艾第一次谈话，寒暄以后，马上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以前，《光明日报》出了问题，我们是不管的，中央一些同志也看到《光明日报》许多问题，都没有管，今后要慢慢地严格要求。

现在党在领导《光明日报》，你们要有党的领

导的观念。

“党在领导《光明日报》”这句话，姚文元重复了好几次。过去《光明日报》没有人管，现在他们“四人帮”要管了。

向中央报告只能送他一个人。在姚文元控制《光明日报》以前，报社的请示报告，许多是直接上报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以后，规定所有的简报、《内部情况》、《文史经哲动态》等刊物只能送他一个人，再由他决定发给谁，就连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也必须先送他审，经他修改后才能上报。这样三年中《光明日报》上报给他的文件刊物就多达165种。完全实行封闭管理。

“文革”中公开出版的刊物少，《光明日报》的《内部情况》和《文史经哲动态》能反映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和学术方面问题，很受外界欢迎，当时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社科院等一些单位，来函希望赠送给他们一份，或作交换刊物。莫艾打报告请示姚文元，姚文元以各种借口表示拒绝。

《光明日报》同志反映，姚文元的领导是个大漏斗，《光明日报》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他，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大自给毛主席的报告，小到收发室安排什么人，他都过问。为什么过问收发室人员安排呢？因为报社里时常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要把住这个出口。

## 一次电话连用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

《光明日报》在“文革”以前，外面有个不好的名声，叫阶级成分复杂、阶级斗争复杂。这个名声怎么来的呢？罪魁祸首是康生。

创办初期的《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主办的一张报纸，编辑记者有少数人是民主党派成员。“文革”前，有一任总编辑，民主作风很坏，不少干部写信向上级反映他的问题。恰巧这位总编辑同康生的关系很好，康生为了保护这个总编辑，给《光明日报》的上级有关部门写信，诬称《光明日报》人员成分复杂，告状的人不怀好意，须作阶级分析。用这种办法压制广大干部提意见。“文革”中，1967年2月，关锋、戚本禹两个人一同跑到《光明日报》讲话，也大讲《光明日报》阶级成分复杂，某某人是国民党三青团，以威吓群众组织。

姚文元继承康生的衣钵，也动不动就祭起阶级斗争复杂这面旗帜。他在同莫艾谈话中，几次说阶级敌人是不会放过《光明日报》的，某某是阶级敌人，某某是坏人。对某些同志的问题，无限上纲。

1976年8月，《光明日报》出现了一次错误，把一篇报道地震的消息同一篇关于地震的社论标题互换了位置。这本是一次责任事故。可是，姚文元在一个长篇电话中，竟用了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词，企图把这个事故定为有人故意搞破坏。遵照他的旨意，报社对有关编辑进行严格审查，又查出身，又查社会关系。甚至同公安部门挂钩，想用专政手段解决问题。这件事后因“四人帮”被粉碎而停止，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

（责任编辑 吴思）

# 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

● 李 普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作者萧功秦先生在文中说: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他说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善良的真正好人,这两者的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危害。

作者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政治文化”,我认为他说得很对。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邓小平从制度的角度立论,他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萧先生这篇文章还说:“按照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我想,只有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因为文化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

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我举个例:

现在拖欠民工工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国务院在继续想办法。有许多欠账的主儿是当地政府,那些首长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资金不到位,欠了再说。他们有权有势,事先就打定主意做不花本钱的买卖,欠工资、欠材料费,欠设计费。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完全不花什么钱。柿子拣软的捏,最好欺负的是民工,他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可见,这在制度方面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有两方面文章必须做。至于上级对于这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有什么责任、应当怎么办,这里姑且不说。

我想的是,由全国人大或各省市人大立两个法:一是重申宪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规定民工有权成立工会,工会可以打官司,同时要明确规定工会只应帮助而决不妨碍民工自己打官司。二是,凡属政府投资而不是私人经营的工程,规定多少款项以上的项目必须经过某一级政协和人大这两个机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项立法还要规定,媒体对于这类工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报道和议论的权利,包括政协和人大对这类工程的讨论和审核。本来我们的《宪法》已经明明白白写了,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权利,似乎用不着再多说。我的想法是,揆诸我国多年来的事实,这里有必要强调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再加以强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也许有人要笑话我这是书生之见,说这种立法完全不可能;说即使立了法,那种橡皮图章也毫无用处。

这话很值得思考。我也并不认为我这办法全国能普遍生效,更不认为能马上生效。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慢慢来,有“法”比没有“法”好,有了“法”也要促其逐步实现,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主张走一步算一步,一步一步前进。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必须着急而又不能性急。换

句话说，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我国的事只要向前走就好，哪怕走得不好看，脚步有点歪歪扭扭也不要紧。

西方有些先进国家，从被称为母法的宪法到许多子法，从立法到行法，也曾出现过波折甚至倒退的现象，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有的国家还设立了宪法法院，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由于出现了违宪的事、防止再出现违宪的事。其实，欧洲各国民主政体从建立到确立，无不经历了专制主义多次的复辟，专制和民主两种力量的斗争一般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法国经过两次帝制复辟；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斗争达86年之久。可见民主政治的确立与法治的实现，在西方各国也是很不不容易的，何况东方古老的我国呢？历史已经证明，暴力的结果只能是以暴易暴，要许多年才能缓过气来。所以我认为这样和平地逐步前进，是我国唯一可取的方针。看起来慢，无效；其实最快最有效。

这是我一己之见。经过反复思考，我希望我没有说错。

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还准备再退一步，我准备这些话毫无用处，全是白说；我的态度是，白说了也还是要说，苦口婆心再说。我这些话，既是对有权者说的，也是对无权者说的。杜鹃啼血，千呼万唤。

猴年来了，我想起了“猴子变人”。不知道这个变化花了多少时间，总不可能是一年两年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刚刚写到这里，偶然看到王绍光先生的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使我十分兴奋。他说美国19世纪末也是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制度既杂乱又低效。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美国号称民主，民众在这方面实际上根本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结果，腐败现象屡禁不绝。预算改革者们指出：“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符其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美国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早在至今不变的1789



作者近照

年的《宪法》和1791年的《权利法案》中已经体现出来。她在财政制度方面的改革，却到20世纪初才进行。我在前面说到政府一定数额以上的投资必须经过政协和人大批准，当年美国这方面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预算改革”。王先生这篇文章说：此后，美国各级政府的每项开支都得说明理由，以便议会考虑各项开支的轻重缓急；没有列入预算的项目不能开支；已经列入的支出不能挪作他用。此外，为了便于民众监督，预算的内容和过程必须透明，等等。这是反腐败。以揭露黑幕为己任的新闻记者被称为“耙粪者”，他们的工作是反腐败。既“防”又“反”，两者都极为重要，缺一不可。文章说：

看似不起眼的预算改革对美国后来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将各级政府行为的细节第一次展现在阳光下，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从而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增强了政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加强了政府内部的集中领导机制，提高了政府整体运作效率，造就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政府。

文章最后说：

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务实的，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产生看得见的变化。

这两篇文章提供的事实给了我很大启发，作者的想法也可以说同我的思路大体一致，因此我很高兴在这里加以介绍。后一篇的建议我觉得很好，究竟对不对，是否行得通，我愿意和读者一同探讨。

（2004，01，15稿，二月改定。北京）

（责任编辑 方明）

# 打倒孔家店与 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

● 刘济生

秦家店是我仿造的一个新名词，仿照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来的。秦家店是以秦王朝为蓝本的一种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它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以终身制度、集权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员的委任制度作为皇权的支柱，以君权神授作为整个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这一制度系统在秦始皇时达到相当完备的境地。秦王朝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二千多年，我们剖析一个秦王朝，就等于剖析了建国前几千年的中国专制体制。

## 一、打倒孔家店质疑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有一部分学者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80多年过去了，我们走进了21世纪。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刷了多少思想？洗刷了多少口号？实难统计。不过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已经被洗刷得斑驳陆离了。当时这些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先驱们，他们的主旨究竟是针对孔家店，还是针对秦家店？有必要根据当时那些代表人物的基本思路来判断，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几句话，一时的思想和主张来判断。

打倒孔家店最猛烈的吴虞，他著文以史籍记载的以礼教名义“吃人”的具体事例，论证了孔子礼教与“吃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

教的就是吃人的人呀！”（《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吴虞一发不可收拾，接着连续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论文，矛头直接针对孔孟思想而去。吴虞还曾说道：“儒家的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庭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在这里，他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把孔子思想当成“根干”，当成专制的根本了。吴虞解释说，因为历来“忠孝并用，君父并尊，教立于家，效著于国”。“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利用这一套说教，“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这里，吴虞用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又有传统的实证方法，对孔孟思想横扫过去。

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在介绍吴虞时，最早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从此以后，“打倒孔家店”便被“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口号之一。当然，“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不一样，程度不同，但后人切切实实把二者给混淆了。从此，打倒孔家店的声音响彻中国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王国，几乎没有衰落过。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才敢于一步一步地去涉及这个禁区。

五四时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尊孔读经，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层面喊出打倒孔家店，但他们恰恰忘了从制度的层面去打倒秦家店。秦家店



和孔家店的关系,是一种皮与毛的关系:秦家店是皮,孔家店是毛。拔了孔家店的毛,秦家店的皮还能长出专制之毛。只有扒了秦家店的皮,才能克服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影响。专制制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思想道德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体制不改变,意识形态会变换花样地存在下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批判过的政治服从、注经学术、等级关系、男尊女卑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个人崇拜。请想一想,打倒孔孟思想起作用了吗?早在1902年梁启超于《儒学统一时代》就说过:“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依。”政治体制不变,学术思想前进了一段,还会倒退回来的。思想离不开政治体制的强力制约。先贤们喊出这一口号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今天如果我们还对那些拔专制之毛的工作给以赞扬,岂不自欺欺人吗?我们不得不再反思。现实教育我们,专制体制之皮能长出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专制之毛,这些毛不一定非是孔家店的毛。

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非常时髦,说洋务运动从器物上的变革,没能救中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变革也没有救中国,因而,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所以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又有人说从文化建设上着手才能使中国走向政治文明。这些都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肤浅之论。戊戌变法在制度上变革没有成功,怎么就能说制度上的变革不如文化上的变革?辛亥革命从制度上的变革成功了一半,使帝制如过街老鼠,这不是制度变革的巨大威力之所在吗?辛亥革命在体制上没有完全确立民主政体,资本主义的力量弱小,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分割没有来得及去做,再加上好多历史偶然性(如袁世凯的个人作用),致使中国的前途一波三折。这本身不是创建体制的毛病,而是体制的不完备。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对民主化的推进,要大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是辛亥革命历史余威而已。

历史的发展体现了悖论的规则,它是一面双刃剑,打倒孔家店,确也发人深省,有一定的启蒙的作用,但后果之一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孔家店还不是一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

吗?建国后,知识分子总是挨批挨斗挨整,我认为和五四时期这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关。另一个大的危害是使人们忽视了专制体制的核心作用,忽视了从体制上建设民主的关键作用。对民主宣传走了一百步,不如在体制上走出一大步。我们反思打倒孔家店,意义正在这里。

当然,文化上的宣传也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民主政治成果的巩固和向纵深发展,必须靠全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

## 二、“打倒秦家店”的湮没

其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流是打倒秦家店,而不是孔家店。结果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响亮,反倒湮没了打倒秦家店的功绩,这是历史性的误会。打倒孔家店反映不了这一运动的实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重要领导者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他们稍带也猛烈地批判孔孟思想,但一直把它作为陪衬来批判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化大师们没有把他们的思想概括为“打倒秦家店”,这真是美中不足。否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秦始皇画像

运动留给我们的口号不是打倒孔家店,而是打倒秦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蔡元培对孔子的评价一直比较平和、客观、公允,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次演说中,针对袁世凯和当时的政府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进行了驳斥:“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1917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封信,又提出“孔子非宗教家”。他说:“自广义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其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自狭义的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神怪。立祀典则以有功德于民及以死勤事为条件。古代稍涉神秘之传说,如感生帝及符瑞谣讖之属,见于讖纬者,皆孔子所删。其不涉神秘可见。故孔子决非宗教家,而孔教为不辩。”(同上,第3卷)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回答了林琴南批评北大“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时,对孔孟思想也表现出冷静和公允的态度。对于“覆孔、孟”蔡元培谈到:“第一点,他否定了北大有这种行为;第二点,说北大有尊孔者;第三,说北大就是有这种观点,也是自由发表的意见。接着,蔡元培回答“铲伦常”,他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即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同上,第三卷)可见,蔡元培没有“打倒”孔子。请注意,蔡元培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高潮之际。相反,蔡元培在谈到专制体制时,都给以否定的评价。如1919年1月28日在致黄郛函中写道:“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同上,第3卷)一个月后,蔡元培又在《新青年》上撰文写道:“李斯之制,焚诗书百家语,欲习法令者,以吏为师。是个人职业教育之自由犹被限制也。进而为立宪的国家,一方面认个人有思想、言论、集会之自由,是为个

性的发展;一方面有纳税、当兵义务,对于国家而非对于君主,是为群性的发展。”(同上,第3卷)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其一生中都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当然要反对孔孟思想的,因为孔孟思想已经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改造,差不多成了专制主义的护身符了。从《新青年》中的文章看,攻击孔教最激烈的且最有影响的要属陈独秀,他先后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特别是在袁世凯掀起复辟尊孔的时候,批判孔孟思想是完全有意义的。1916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上发表《宪法与孔教》,他甚至说了过头的语言:“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由此可见,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激烈批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激烈,陈独秀却明明白白知道孔孟思想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孔孟思想的作用比政界帝王影响大,但绝不能和专制体制相比。帝王毕竟不等于专制体制。陈独秀反对把孔孟思想写进宪法,所以他明确申明“使仅以‘孔学会’号召与国民,尤吾人所赞许”。如果专制帝王复辟他还赞许吗?

同年,陈独秀在12月1日的《新青年》上写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治,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动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的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这里,陈独秀对专制政治表现出根本的否定态度,没有讨论的余地。陈独秀在1917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又发表了他的看法:“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常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

看比登天还难！”这时，陈独秀把眼睛紧紧盯住了专制政治体制，把它作为头号问题，至于对什么孔孟思想他不再那么激动不已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他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批判更加深刻了。我将在后面列一问题再议一下。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李大钊对孔孟思想批判非常猛烈，但从他整个文化思想趋势来看，他反专制是第一位的，反孔孟思想是第二位的。他分析了专制体制和孔孟思想二者的表里关系，但其批判的主要锋芒直指专制体制。1916年5月李大钊写了长篇政论文章《民彝与政治》，对孔孟思想和袁世凯的专制政治和尊孔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大钊写道：“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自有耶苏，而犹太之民族不啻为耶苏而生，耶苏非为犹太民族而生焉。自有释迦，而印度之民族不啻为释迦而生，释迦非为印度而生焉。是故释迦生而印度亡，耶苏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吾华衰。……四千余年历史之足夸，即其四千余年之足病者乎？”而吾民族思想之固执、踏故习常、安之若命，“盖自有周之衰，暴秦踵起，用商鞅、李斯之术，焚书坑儒，销兵铸锯，堕名城，徙豪杰，生民之厄，极于此时。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源，斫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也。”可见，李大钊清清楚楚知道对孔子的崇拜是专制帝王搞的，是“为一姓之私”的目的。他更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只是有专制主义的“嬴政之政”。这一认识已经把专制体制的政治和孔孟思想的地位理解得非常透彻了。

李大钊接着分析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乃能成其伟大之功德”，“有式范人伦之权威”为什么在后来绝迹了？原因在于“乡愿”和“大盗”的结合，“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切不堪矣。”李大钊在肯定古代

这些圣人，但对其后学者则冠之以“乡愿”，进行否定的评价。而对秦始皇和李斯之流，则毫不留情地给以批判。对于当代的准备称帝的袁世凯则严加痛斥，并把袁世凯和秦始皇、曹操、王莽联系起来。“例证不远，即在袁氏。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于华、拿，忽变而为切齿之曹、莽，……秦政之事，……曾不二世而嬴氏子孙身死人手矣。”此文愈往后面，愈对专制政体表现出愤慨，愈对专制政体批判的毫不留情。他认为，“专制政治孕育之思想，今以无一顾之值。”“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对于神州陆沉，李大钊最后找的原因愈来愈清楚了：“余思之，切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李大钊主张对鼓吹专制政治的人不能姑息养奸，要永绝其萌，要再造民主之中华，迎青年之我，不负此河山。李大钊在此提出的是“君与民不两立”的严肃命题，他没有提出孔子与民不两立的命题。

到第二年，针对北洋政府把孔教写进宪法，他在《甲寅》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以更概括的语言分析了孔子和专制政治的关系。他写道：“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又写道：“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余掎击孔子之本身，乃掎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掎击孔子，乃掎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掎击孔子，实质是为了掎击专制主义，此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李大钊已经从政治体制和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上来认识



汉砖画像荆轲刺秦王

问题了。最说明问题的是 1919 年 7 月 13 日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小短文《万恶之原》，他写道：“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什么关系？第二年，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一文中明确写道：“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所以说，李大钊其重拳出击的是秦家店。

易白沙一马当先，最先在《新青年》上就儒学问题展开讨论，揭橥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他也认识到孔子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他认为孔子因何因缘被利用，因为孔子本身有缺陷。第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第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第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第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1916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从以上引用可以看到，易白沙明明白白知道孔子的思想是一回事，专制和君权是另一回事，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易白沙也是为了反专制而反孔子的。

吴虞虽然激烈地反孔，但在有的地方也明白孔子是为专制服务的，他在一封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进步文化之发展，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新青年》第 2 卷）在“余焰”下面是什么，是专制的燃烧物。为什么猛烈攻击孔子，“势也”，形势所迫也，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尊孔，批孔就是大势所迫。这也说明，凡是对孔子有一定研究的人，不能不看到孔孟思想的服务性质。

孔子后来被历代的儒

士们塑造成了专制政治的偶像，不是孔子个人之错，其实，孔子当时是反对绝对专制政治的。我在另文要详细论述。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没有从学术上认识到孔子反对绝对专制政治这一点，但他把孔子已经放到次要的服从地位来反了，（他还有好几篇文章谈“孔门”的思想观点，说明他注意到了孔子与后儒的不同）他批判的锋芒直指秦家店，直指专制，这是明白无误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锋芒是批判专制体制的，因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把“打倒秦家店”这一口号给湮没了。这真是历史的大大的误会，是和后人开的大大的玩笑。

### 三、陈独秀后期“竟《新青年》未竟之功”

为了说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目的和锋芒是打倒秦家店，最好看一下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在后来是怎样继续批判专制主义的。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陈独秀后期提出了“竟《新青年》未竟之功”的历史任务。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那些

领袖人物其不可释怀的思想是继续坚持批判专制主义的体制，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孔孟思想了。

陈独秀在 1940 年 9 月 15 日给老友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上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他以衰弱之躯勇敢地肩起时代的闸门。在 1940 年前后的几年里，以他的无与伦比的政治理论素养比别人早 40 年、早 30 年、早 20 年认识了斯大林体制。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是把



孔子杏坛讲学图

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大旗举到最后的伟大思想家。

1940年3月陈独秀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六七年前，他正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陈独秀在监狱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他又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此理。”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能说出这样的语言，真令后人惊愕不已。1940年8月，他写了《我的根本意见》，共15条，其中关于民主的有3条：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并不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史(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不过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连在一起。

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论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法西斯独裁存在尖锐的对立，其

优劣不言而喻。这时的陈独秀已经透过苏联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看到了其背后反民主的本质。他理论的洞察力和对现实的观察力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

1942年3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又谈到对民主的思考：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必然流为史(斯)大林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些。”因为陈独秀把民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制来看待，深刻认识了体制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又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他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而已。”他认为民主不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现象，“民主是古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是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及已经死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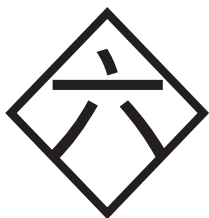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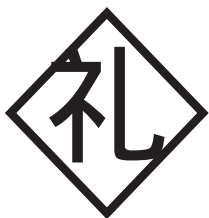
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的这一看法太厉害了，这才是理论的锋芒。说出这种话的人物才是伟大思想家，伟大政治家！他把民主看成是人类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民主是极少数人所有，而在近代这个“极少数”变为“少数”了，愈往后享受民主的人就会越多。在民主的身上绝不能打上某某阶级的标签。

这就是陈独秀的“竟《新青年》未竟之功”！

至于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也一直坚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后来这些文化大师们的注意力看，他们一直是反对专制主义的。胡适在自己一生中，坚定不移地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人可比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出现的打倒孔家店，真有点昙花一现的样子。这朵昙花又在“文化大革命”中二度重开，也没有多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吴思)



● 邵燕祥

盾”，所以没忙着把他们打成“里通外国”或“卖国主义”吧？

—

美国出兵伊拉克，转眼快一周年了。

当时美国声称要抓萨达姆；国际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支声音，就是抨击美国搞霸权主义。

美国抓住了萨达姆；这支声音弱了下来，有的转而向美国示好，当然也许是为了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也许是承认并接受既成的事实。

只有在美国国内，除去为了竞选的言论不计，一直有一支民间社会的力量，仍然坚持不懈地对布什政府的决策持批评态度甚至有点揪住不放的样子。

这在今天，可谓算后账了。

而在战争进行期间（须知那是战时啊），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好，街头游行的群众也好，不少人那么肆无忌惮地反对出兵，干扰政府的决策于前，破坏战时后方的社会稳定于后，不顾大局，不顾影响，不仅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还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从总体到细节批评政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这不是长伊拉克的志气，灭美国的威风吗？这些美国人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美国的“公检法”如此软弱无力，对这些涉嫌对抗既定国策、破坏国家安全（还有例如泄露了情报可能不准确这类重大国家机密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从快从严加以打击，反而任其淆乱视听、进行煽动呢？为什么以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竟也无视其司法部门的失职呢？这就是美国在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我只读过三年英语，且都已还给老师了。至今只能以中国之心度美国之腹。因此搞不懂：如人们所说，美国要在全球称霸，为什么对国内的一小撮反对派，却一点霸气也没有？也许真如国内一些报纸报道过的，某一位或某几位美总统的案头放着毛泽东的大作，经常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也许他们真学会了区别两类矛盾，而认为那些人的反战是“认识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

二

老同志于光远，在年尾年头所发的贺年信上说，“我已经八十八岁半了”。犹忆四五年前，他曾经笑逐颜开地说：“我现在可以跟毛泽东商榷问题，甚至可以批评他了”，那理由是，“我现在的年龄已经比他大了”。果然，毛泽东生于 1893，卒于 1976，终年 84 岁，是不会变更的了，而于公健在，还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不知不觉超过了毛公的阳寿。当时有人促狭，说，依照党章，任何一个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直到现任以至前任的最高领导人，都有权进行批评，并不需要以年龄为先决条件的（说得有理，否则，那些领导人健在时就永远听不到比他们年轻的人的批评了）。大家一笑。

不过，可以想见于公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党内生活中，不仅历经对领导进言之难，而且大约饱尝了论资排辈之苦。

另一位老同志曾彦修（又是杂文家，笔名严秀），也是年过八秩的耄耋老人，但近读他一篇关于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述史之文，仍强调自己“小小的晚辈”的身份——说的是 1948 年的事，但其时他似乎也已三十岁上下，只因话题涉及到康生、刘少奇等更老的，或说是革命资历更长、党内职位更高的人，曾老提笔时也许又想起了参加革命之初的某些教训，万万不敢以“晚辈”而平起平坐，而形同僭越吧。

相形之下，这个论资排辈和领导在上的精神压力，在于光远那里摆脱了一半，在曾彦修那里，似乎遗留的影响还不小呢。

想到这里，像我们这些更晚的晚辈，在于、曾等老人面前，真也是应该如孔孟之徒所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惟恭惟谨，不敢妄言，连商榷也难的了。

我不得不深思,曾经以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相号召的共产党人,能够视海内外的敌对者为纸老虎,为什么竟不能如孔孟之徒标榜的“说大人则藐之”呢?

### 三

中国的史籍上,没有过“人权”这个词。

人权,是天赋的,而人权的观念,则来自《人权宣言》等法兰西和美利坚的经典。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人权,首要的是生存权”之说。这一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据说受到体制外的论者的质疑。

我因长期受的是中国的革命教育,并不知道人权为何物,望文生义罢了。对于生存权,我说不出不同的意见,觉得也符合长期积淀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心理,历代农民也罢,游民也罢,不都是饥寒交迫,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么?

对于有关的驳论,只是偶尔听人一说,没见过白纸黑字的文章,我想,如果不是毛主席说过的“别有用心”,就是毛主席说的“书生气十足”吧。

近悉两家教学科研单位整理有关档案后归纳的一些非正常死亡数字,我就更加服膺生存权的重要性了。

中国历史上“横死”之多,至少不下于其他国家。所以中国才推重“寿终正寝”,忌避“死于非命”。远的可不说了,我所经历过的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秘密处决虽没有亲见,而公开的杀戮则不绝于耳,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似已遥远,不必多说了。

半个世纪以来呢?据统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有党员和群众,乃至毛泽东的战友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许多万人死于文革十年,有党员有干部有学者,也有各界人士普通群众,处决的,逼死的,他杀的,都出于所谓政治原因。

还有一批是因饥饿而死的,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相信“不能饿死一个人”之说,也只听说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饿死过人;现在才知道,除了1959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几千多万人外,单是60到70年

代中后期,每年饿死的人也为数不少。

中国人口虽多,但一条人命却也是一个生灵,他们理应有权在这片国土上出生,成长,生存以终老。这就是所谓生存权吧。

要研究中国人这么多年间的生存状况,不妨首先研究中国人不得生存的状况(不是“生老病死”的正常死亡,而是非正常死亡),从这里着眼、入手,来考察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不失为一个探讨因果,总结经验的途径,我想。

### 四

李锐为回忆录《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所写的序(《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引述了作者廖伯康对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印象。廖在1960年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他和另外两位重庆市负责干部(萧泽宽、李止舟)曾经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两年多后,他们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期间,廖在北京上访时,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遇到的大学生,听了他的说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回公道。他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

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看到原作的全文,不知作者是否有意回避了类如“红卫兵”、“造反派”这样的字眼(又如仅笼统说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实际应是该院“东方红”红卫兵)。

但李锐在序中点出来了,他说,人们一谈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他们所做的努力令人感动。这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他认为,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



邵燕祥漫画像 丁聪画

信心,对民族未来的信心;他认为廖伯康有关的记述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我以为,随着对文革历史研究的深入,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研究,必将摆脱大而化之的全称判断,而从大量掌握材料进入具体分析。不过,这需要相对的时间距离,才能不受派性残余和若干实际功利及人事关系的干扰,做到客观公正;但时间搁久了,有些当事人的记忆又会失去准确和鲜活,确属两难。也许红卫兵方面的材料还易于征集,因为当事人一般还没有超过60岁,而当时成年人中沦于“败者”地位的那部分造反派,由于长期处于劣势,他们对于亲历的那段历史的个人叙述,也许该提到“抢救”的日程上来了。

## 五

近读一篇关于饶漱石的文章,说他讲过,对知识分子,要“先小人,后君子”云云。

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饶漱石其人揽权跋扈,特别是借整风之机打击陷害陈毅一事,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知。至于他对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态度究竟怎样,毕竟因为他不是党史研究的热点人物,不见有人提起。

“先小人,后君子”,这是一句民间流传的熟(俗)语,但不是一般的熟语,近于格言,而且是像“无毒不丈夫”这样带着冷面杀手气的处世格言。应用的场合不同,含义也有刚柔伸缩之变。比如,民间借贷,双方都是熟人,但还是书写字据,立此存照,这是犹如“小人”之互不信赖;依约办事,不伤感情,实为两便,便又俨然“君子”了。而若在本来并不平等的两造之间,有权可恃或财大气粗的一方说出这个话来,就带有威胁的性质,意若曰:你若不就我的范,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所传饶说此话,该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苏北,时当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通知之后,苏北根据地和新四军中,除了原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以外,陆续有知识青年投奔而来,地方上也有教员学生和其他读书人。不知这个“土”原则,仅仅是一方党政军最高首长心理活动的表露,还是真的已经作为执行政策时的参考和补充了。

这使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革前夕上海最高领导人柯庆施,也有一句众口腾传的名言,说知识分子是“贱货”,三天不敲打一下就骨头轻,就翘尾巴。

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罢,扩而大之全体中国人也罢,其中确有“贱货”。但柯在这里又犯了一次滥用全称

的错误。领导人的思想,在我们这里往往是等同于指导思想的,以“贱货”视知识分子,决定对策时,怕也只能“小人”不会“君子”了吧。

南方某刊曾经载文对柯有所批评,主要是说到他对江青的支持;随后有人为他辩护,大意说江青到上海来组织文革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已生病,不久就死了,并未介入。为了弄清历史真相,这是正常的。无论对“毛主席的好学生”或对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都应实事求是。只是想起柯的“贱货”之类的话,如果属实,不知是仍然叫他“毛主席的好学生”还是不叫为好?

## 六

1988年,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可能是《人民政协报》吧,记不清了),发过一篇短文,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一份机关报,那理由,简单地说,中国历届宪法一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政体,阐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常委会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并列为“四套(领导)班子”;不但中央如此,各省市自治区直到县级均照此办理。而人大以外的几套班子,都各有机关报,惟独人大阙如,不知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到了90年代,我又发了一篇短文,重申这一建议。鉴于当时正在压缩报刊,我强调这样的报纸,可以只限全国人大一家,不必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群起跟进。

现在已是21世纪,我再提起这个话头,似已不须多作解释。别的都不说,至少我们中国公民,应该知道人大代表都做了些什么事。全国人大代表虽然不是我们直接选出的,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各个代表人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提了些什么提案,有了些什么结果,不应该向公众公开,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吗?这里所说公众,包括推举他们为代表的省市人大的代表们,自然还包括推举省市人大代表的县区人大代表,以及人数最多的,投票选举县区人大代表的每一个选民。

据说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领导机构,把报刊分为大报、小报,然则我所建议应办的,至少是不低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份“大报”;因为按照历届以至现行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全国民意的最高权力机关呀!这样一份大报,不仅应该办,还应该办好,让全国人民都爱看,不用派购派订,有经济能力的公民都自愿掏钱订阅;这份大报主持的民意调查应该是最公正



最可靠最不掺假不掺水因而也是最权威的。

这样的建议,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显然不会只是我一人提出,却不见任何下文。若说报刊已经泛滥,新的报刊要“计划生育”,难道这样一种机关报老是列不到生育计划中来?而所谓小报小刊(其实未必“小”)姑且不说,却见不断有篇幅不小但内容“小”中见“小”的报刊陆续面世。你说怪也不怪?

附带说一句,中国还应该出版一份报道和研究人权

问题的“大刊”,以体现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中国出版的报刊,严格限制以“中国”冠名,这份刊物如办起来,则应郑重地命名为《中国人权》。为什么这样刊名的刊物,不是首先出现在大陆,而是让海外、境外的从业者著了先鞭?怨我在这里冒昧套用毛泽东的一个句式: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人权研究会等单位全都干什么去了呢?

(责任编辑 吴思)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到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两册)本书是一本史料汇编,作者的阵容极其强大:从毛泽东、董必武到张国焘、陈公博,从张闻天到李德生和“林办”的秘书,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风云变幻,听亲历者娓娓道来,分量和实感自是不同。书中还穿插了一些考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率等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28.80	5.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科戈诺夫	78.00	8.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9.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	李剑	49.80	7.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8.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5.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们 肖思科	28.00	5.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5.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5.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5.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5.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5.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安	26.80	5.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5.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5.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5.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希	25.00	5.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帆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 甘惜分

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说它全部失真。恩格斯有言：向自己犯过的错误学习比任何学习都要来得深刻。皖南事变那次错误实在是我们的老师。

我党我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所以才有后来的全国性胜利。但也打过几次大败仗。败仗最严重的为红军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八万之众，损军五万，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大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和那位德国顾问的瞎指挥实难辞其咎。但是这次大败也没有伤了中国工农红军元气，指挥部都过了湘江。到了遵义，清算了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了统帅部，经过艰苦长征，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三万人到达了陕北，保存了革命火种，实在是一次大胜利，是中国革命由败转胜的转折点。还有一次大败仗，是内战时期西路军在祁连山的覆灭，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难言之痛。但几位领导干部也都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唯独皖南事变这一次大败仗损失军部九千人马（逃出极少部分），几位统帅：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都全军覆没，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惨败。不是败在民族敌人日寇之手，而是败在所谓“友”军之手，蒋介石凶相毕露，必欲全歼我军而后快，我们的同志钻进蒋方布置好了的战争口袋中，这是我军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中上了一次最大的当。我军为什么犯了这样一次大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今年1月7日是蒋介石围歼新四军事变63

周年之日，我们痛定思痛，不妨加以述评，并以悼念先烈。可否总结这样三条：

- 一，以弱避强，以实击虚。
- 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
- 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所谓以弱避强，就是根本不应该把新四军军部安置在皖南泾县的云岭。新四军是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闽、赣、粤几省边境分散游击作战三年，在抗日战争初期重新聚合起来的十来支游击队数千人。他们在丛林中煎熬了三年，艰苦卓绝，实属不易。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时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皖南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腹心之地，它的十多万人马十多个师都驻扎在皖南一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个“他人”是一群共产党人，蒋介石岂能任其驻扎不走，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千方百计逼走新四军。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一住三年，安家立业，坛坛罐罐，越来越多，后勤部门，越来越大，搬家搬不动，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下了决心消灭新四军，这时新四军军部想走也来不及了。如果早走，向东向北，都大有回旋余地。日寇侵华，兵力不足，除了占领一些大城市外，广大城乡都顾不上，正给我军以大发展之机会。敌占城市我占乡，山山水水稻米香，何处不能打仗，何处不能发展，为什么要挤在皖南那寸金之地，与“友军”天天搞磨擦。新四军兵少枪少，人困马乏，何苦与强敌为邻。应该避而远之。

据说新四军驻兵皖南，党中央也有责任。但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东南局书记的封疆

大吏,完全有向中央建议和机动指挥之权。所以皖南被歼责任主要应在项英,他有不可推卸之责。尤其是1940年底,蒋介石已杀机毕露,新四军快走还来得及,但项英一次次拖泥带水,总不挪动,致受毁灭之灾。项英是否对抗日统一战线另有想法,这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当时党中央设有三个中央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国统区工作均由其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华中工作均由其指挥,以上两个中央局由于领导得力,均从未出过重大损失。东南局书记项英,祖国东南半壁江山均属之。项英担子很重,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性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这大概又和他三年丛林生活,与外界隔绝,又未参加1937年洛川会议,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精神理解不多可能有关。

江北形势就大不相同。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沪、杭地区,与日军战斗,也与蒋军磨擦,独立自主开辟战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1939年逐步派军渡长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大举过江,与来犯的蒋军顽固派韩德勤部一战,以自己的不断壮大的实力对付虚弱的韩德勤,将其击溃,巩固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

这就是皖南的以弱避强而不避和江北部队的以实击虚而得胜的经验。

与此有关,新四军还有一个内部统一和对外统战的问题。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又是南昌八一起义领导人之一,但在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批评,退出共产党到欧洲去考察了几年,抗日战争前即已回到澳门,1937年回国请缨抗战,蒋介石由于叶挺系非中共党员,企图拉拢他,把新四军变为国民党军,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这时他虽无中共党籍,他到延安,受到盛大欢迎,与毛泽东长谈数次,党中央支持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作为东南局书记和军政委身份的项英,中央一再叮咛他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实际上项英对叶挺产生一些难于言说的矛盾。外表上相互尊重,实际上叶挺并无军事决定权。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二人之间是是非非,恐怕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1939年5月,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了解新四军情况。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合法身份穿行于蒋军驻地之间,他这次皖浙之行,捎带探望故家,实为政治活动。他在新四军干部会上指出,新四军发展方向有三原则:一,哪里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开展游击战。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创造新的根据地。三,哪里只有日军伪军,我们就到哪里去。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地处中国东南,任务重大,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群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在与项英单独谈话时,周恩来指出叶是自己的同志,是中央同意他暂时留在党外对党的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攻击,即皖南事变。图为途经茂林镇的新四军

事业有利,他的非党身份有利于他在蒋军中的统战工作,要尊重他的军事指挥权。

但周恩来的面示,项英并未落实。

项英除了不应该长期驻扎皖南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这更说明了挤在皖南的错误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指出新四军要到日军伪军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抢占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不同蒋方磨擦,这个意思不知为什么不被项英理解其深意,新四军在云岭一住三年,所有地方官员都是国民党委派,所有粮饷费用,都要依靠第三战区顾祝同发给,自己不能自力更生。蒋介石下令卡住新四军的脖子,不发粮,不发饷,不发枪炮,不发弹药,不发医药,制你于死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有武装而无政权,武装力量就无法生存。华北和中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那里随着我军的进驻,早就建立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立脚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走群众路线,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站住了脚,什么反动力量我们都不怕了。

而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一切生存费用全靠国民党发给以及一点华侨捐物。大家都佩服项英生活作风很好,艰苦朴素,风餐露宿,但他不能使新四军免于败亡。由此可见懂得战略是治军的首要问题。

同国民党讲抗日统一战线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抗日这一点上讲统一,推动它抗日,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但绝不能什么都统一。统一战线的前提就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凡有日伪之处,我们都可以去打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千万不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蒋方把我们统一了过去。各打各的仗,各算各的账。经过了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之后,我们还不了解蒋介石是个什么货色么?别看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见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笑容可掬,内心里却绞尽脑汁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算盘,我们不要当傻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不断壮大自己,最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西北和华

北,我军虽也与蒋军为邻,但我军有抗日根据地,我军有政权和群众支持,故我军能发展和壮大。皖南新四军就吃了这个亏。身负东南一方重任的项英同志对这个问题似乎领悟不深,不然他就不会呆在云岭三年之久,看不到自己脚下快要火山爆发。

这就是上面所说教训之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内部统一思想,才能对蒋介石讲统一战线。

教训之三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皖南事变,我们惨败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新四军全军覆没,只能说军部覆没(也逃出了少部分人员)。新四军的一部分早已渡过长江,在苏北皖北广拓领土,披荆斩棘。后来新四军大部也渡江北上,新四军还在,新四军这块牌子还在,不但在,而且大肆扩张,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战略领导和陈毅、粟裕、刘少奇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他们在1939年形势危急之际,一、二支队首先以突然行动,东进苏南,活跃于沪杭之间,然后,渡江作战。以盐城为中心,抗敌扫顽。开疆拓土,声威大震。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边不亮西边亮,只要领导者意志坚强而又灵活机动,总是有办法的。新四军军部完了,一个新的新四军军部却在苏北建立起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项英革职查办。但中共中央在延安宣布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之下扩大为七个师,从此这个新的新四军就再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了,哪里有敌人,就哪里打,无法无天,南征北战。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共产党这一步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是他在军事上的大败。

蒋介石还有政治上的失败。1940年11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先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一个皓电,以上压下的口气,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一律移至黄河以北。朱、彭、叶、项回了一个“佳”电,(出自毛泽东手笔)委婉地表达撤军之难,希望新四军只撤到江北。这封“佳”电全是文言,文章很长,文词典雅,以下级对上级的口气既有让步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入情入理,一切正

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在江西南昌合影。左起,前排: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顾正良、沈冠园、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义之士读了无不动容。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干部远在西北,反复读了这封“佳”电,很受教育,认为是篇奇文,一定会在国统区广大中间人士中引起广泛同情。但这封佳电丝毫打动不了那一帮反动派之心,何白二人又来一个“齐”电,仍坚持前令。这一电已是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武力解决之决心已下,调动七个师兵力,准备好了围歼新四军军部。1941年元旦刚过,就大战爆发,围歼奉令北撤的抗日部队于皖南茂林。

写到这里。本想论及事变骤起,军部指挥失当。不分散有序地冲出去,却与强敌死拼,继而自发逃生,伤亡惨重。但由于作者不在现场,现在也众说不一,这里只得略而不谈。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封锁报纸发表事实真相,反而宣布新四军叛变。中共方面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以命令口气要对方严惩罪魁祸首,释放叶挺和被俘人员,释放所有政治犯,审判亲日派首领……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禁令发表自己的大字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发出最沉痛的悼念和最强烈的抗议!此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占了一点便宜(其实它在苏北大败),在政治上却打了一场败仗,大失人心。蒋介石亲口答应以后不会再有剿共军事了。这一事件其实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两党关系已由敌大我小,敌上我下,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关系,一变而为双方平等谈判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虽然蒋方在军事上仍居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已处于平等地位了。这同抗日初期已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居高临下的架子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经过几年的磨擦和反磨擦,打击和反击,使蒋介石不能不认识中共是个实难对付的对手,不得不平起平坐了,从此以后,才开始了以后几年不断的谈判。所以皖南事变,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其失也哀痛,其得也壮伟。再往后我们越发强大,抗战胜利时我军已达百万之众,蒋介石被迫举行重庆谈判,中共已占上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到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时,不过三年,蒋方全面崩溃,新中国建立起来。回顾1941年皖南事变蒋介石的趾高气扬,可怜是南柯一梦。

从皖南,看统战。抗日统一战线是伟大战略,坚决执行则战无不胜,拒不执行而左倒右倒,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

叶挺被蒋介石扣押,监禁五年。1946年经中共方面再三交涉释放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4月8日乘飞机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刚获人身自由即遭人生覆灭,命运之惨痛有如此者,悲哉!(责任编辑 吴思)

## 本刊发行部启事

根据京邮[2003]232号《转发关于调整国内邮件挂号费等问题的通知》,自2004年1月1日起,所有国内邮件挂号费在原来的基础上上调1.00元。因此,我社决定作出相应的调整。请大家谅解。

# 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 孙瑞生

## 一、农民是这样“自愿”入社的

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不足十户的小合作社。因为这个社的社员中，有我一个同学的家庭，所以我对它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这个社的成员，都是当时农村中比较贫困的农户。他们都没有牲口没有车，地里没有水井，当然也就谈不上井上的水车了。他们组成合作社后，耕地播种都是几个人合着拉犁拉耩；浇地，则是向有井有水车的地邻借用，趁着人家不用的时候使用（通常都是午休或夜晚的时间）。水车也是几个人合着拉。因为他们确实是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社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可说是齐心协力。自1952年建社，经1953年到1954年，社员的生产生活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课堂上听了那一番道理，才知道原来这几户贫困农民竟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我对这几户农民，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并且对于父亲迟迟不想入社而感到遗憾。我决心在回家的时候力劝父亲尽早入社。我觉得如果父亲再不入社，我这个中学生很没面子。

于是，一次探家时，我便把从课堂上“趸”来的那些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知识向父亲兜售。没想到，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把“优越性”卖给了我这个中学生，而我磨破了嘴

皮子，也没把“趸”来的货卖给父亲。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家有牲口有车，地里有水井，井上有水车。而那些社员则是要啥没啥。因此，我家入社，肯定是干吃亏。他这么三言两语，便把我弄得张口结舌，呱呱背熟的那几条“优越性”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以后的几次探家，每一次我都试图再劝父亲。起初，他还驳我两句，到后来就干脆不理我了。我一怨父亲太顽固，二怨自己没本事说服他。

暑假到了。当时初中升学考试，实行地区统考。我和班上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对本地可以报考的那些学校都不满意，就结伴到北京考学。因为我们报考的那个学校考期很晚，所以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才考完回家。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入社了。我问他是怎么一下子想开的。他说：“哪是什么想开了，是不入不行啊！”

原来在我赴京赶考的这段时间，县里下来了几个干部，那天是晚上，他们召集村民开会。会上他们讲了一番农业合作化的大道理，就让人们报名入社。但只有十几户报名。散会之前干部讲话：“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因此县委派我们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县委要求我们，这次下来，务必把大家引上这条康庄大道。县委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今天入社自愿，以后退社自由。绝不允许我们强迫大家入社。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看来是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有耐心，也有信心，一定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加入合作社。明天晚上，凡是今天已报名的，可以不来了；而没有报名

的,务必还要再来。”

第二天开会,再讲一遍“道理”,又让大家报名。到散会前又有十几户报名。

散会前,干部讲话的内容,与昨天的一样:已报名的,明天可不来了,没报名的,务必再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起初县干部还讲几句,到后来,干脆就什么也不讲,只等着人们报名了。大家你瞪着我,我看着你,熬呀熬呀,熬不住了,报上名,就算解脱了。

父亲终于也熬不住了,只好把心一横,作为最后一拨中的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听了父亲的叙述,并没有因为他终于入了社而高兴,倒是为县里干部们这软中带硬的工作方法而感到迷惘:这样搞起来的合作社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吗?

暑假后我到北京上学。在学校我经常一阵阵想起父亲,想起家乡那些合作社。父亲能做一个好社员吗?合作社能办好吗?

放寒假时,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盘旋。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那个社根本就没有办起来。一个多月后,县干部走了,社也不声不响地散了。

## 二、退社风潮是怎样制止的

转眼我已在北京读书一年多了。1955年冬,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全国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入了社,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时的合作社不是1952、1953年的那种几户、十几户组成的小社,而是几十户、几百户的大社,叫高级社。

我的家乡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这个“奇迹”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我已不需问人了。如果说,1954年,那些县干部们嘴上还说说自愿原则,到1955年,他们已决心不再受什么自愿原则的拖累,干脆“合作没商量”了。



邓子恢(左三)视察福建农村

1956年春节,我照例回家度寒假。

大约是从1955年底(阴历),村里就陆续有人找到县驻村干部程某,要求退社。到春节前,要退社的人越来越多,合作社大有天塌地陷之势。

正月的一天,程某召集全村“社员”开会。会上他愤然陈词:“这些日子以来,人们一个个要求退社,这完全是因为有坏分子(当时还不时兴‘阶级敌人’这个字眼)捣乱。这个坏分子就是孙老先。”他说的孙老先是个中农。“对这样的坏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必须严厉打击。现在我宣布,把坏分子孙老先捆起来,押赴公安局法办。”他当即命令两个民兵,把60多岁的孙老先捆了起来,拉到众人面前低头站着。程某继续讲:“孙老先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人们退社。所以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我知道,还有那么几个人,跟孙老先是一路货色。今天,我暂且放你们一马,看你们今后的表现再说。”

散会后,孙老先被押送到了公安局。

全村那些闹着要退社的人们,一下子便都偃旗息鼓了。

过了一个多月,退社风潮平息了,孙老先也被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了。

自此,我家乡的农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农

民一样,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康庄大道”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每一次我听到、看到这句名言,脑子里就会想起孙老先老人那被绑送的一幕。

### 三、收购谷草的故事

1956年上半年,我因病休学在家。大约是四月的一天,我在屋里看书,隐约听见一阵争吵声从邻居王家传来。很快地,声音由低到高。我放下书本,出门去看。原来,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和王大妈争夺一把谷草,嘴里还大声吵嚷着。那年我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又自以为是在北京读书的学生,眼见大妈受欺侮,岂能坐视不顾?便三步两步赶过去。我愤怒地命令那陌生男人:“住手!你是哪儿来的?要干什么?”此时,原本站在门外看热闹的十几个男女老少都已随我来到现场。那陌生男人听我的口气,本能地松开了手中争夺的那把谷草,转过脸来,喷着吐沫星子冲我说:“嗨,你问我是哪儿来的?干什么?好,我就告诉你。我是大社的副社长,是奉社长之命来收购谷草的,遇上了这个顽固女人,她愣是不肯卖。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竟敢挡我的横车?!”我高傲地说:“你别管我是干什么的,路不平有人修,事不平有人管!像你这样跟土匪似的欺负老百姓,谁都可以管!你说你是收购谷草,那就是买。既是买,为什么还要夺?!”这时王大妈告诉我说:“什么买?他们根本就不给钱。说是记上账,其实以后也不会给钱!”那位副社长火冒三丈:“好,你说我是夺,那好,这谷草我还是不收了,误了事就冲你说了。走,你跟我到大社办公室去!”

“去就去,我还正要找个地方告你这个土匪作风呢!”

五分钟后,我跟他到了大社办公室。原来从1955年冬,一夜之间实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合作社的规模一大再大,先是一村几个社,后来全并成一村一个社,再后来又合成了六个村一个大社。这时的大社社长,已相当于此前的乡长了。

一进办公室,那位副社长就冲着—张方桌后面的一个年轻人喊:“王秘书,这谷草没法儿收了,又有坏人挡横车!你看怎么办吧。”说着他便气呼呼地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位王秘书不问青红皂白,“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说,你是怎样破坏郭副社长的工作的?”这时我已坐在他对面的一条板凳上。见他拍桌子,我也重重地拍了一下:“你还别这样诈唬唬的,你以为谁会怕你不成?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我是大社秘书。我现在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是怎样破坏副社长工作的?”

“噢,听你两次说刚才那人是个什么副社长。我问你,在这里是不是随便长个脑袋就可以当副社长?!”我冷笑一声。

“王秘书,你消消气,我来跟他谈吧。”这时有人跟他说话。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本村的马国庆。我随即喊了一声“国庆叔”。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喊着我的乳名:“走,咱们到那个屋去谈吧。”我跟他到对面的一间屋。他指了指方桌前的一条板凳,让我坐下。他走到桌子后面坐下:“怎么回事?你不是在北京上学吗?怎么惹着大老郭了?”他问。

我把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最后又加了两句:“听说他还是个副社长,可看他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土匪。他哪是做工作,明明是在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声誉嘛!我敢说,如果刚才那一幕,让毛主席遇上,绝对会就地撤他的职。”

“你在北京读书,哪里知道这农村的情况。工作难做呀!说实话,你要是斯斯文文的,许多工作还真做不下去。”

他又接着说:“哎,我跟你讲,你这几年不在家,农村的好多情况你不知道,以后再遇上这种事,可别再瞎掺和了。说真的,今天你是遇上我了,要不然,他们揍你一顿,你也没处说理去。”

“国庆叔,我还没问,你在这儿是什么官儿呀?”

“我是社长,要不然,他们才不肯把你交给我呢。你呀,回家去吧。”

我走到半路上,老远就看见父亲惶恐地从对面走来。一看见我,便生气地说:“你不好好看你的书,给我惹什么祸?他们没有怎么着你呀?”

(责任编辑 吴 思)



# 不尽哀思念宝桐

● 金凤

相知相爱 50 年、风雨同行伴终身的宝桐走了，我不能吃也不能睡，撕心裂肝的痛啊，天人永隔的痛啊！世界上最疼爱我的宝桐走了，你怎么忽然不见了？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泪眼迷离中，我看到你超负荷重载的一生：你悲惨的童年，屈辱的少年，奋起英勇搏斗的青年，看到你和我的相识相知、悲欢离合，看到你情系蓝天、梦驰太空……

你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郊赵家堡村一个赤贫家庭。家中地无一垄，在祖坟边盖了两间土坯房。父亲打工谋生，养不起家。母亲刚过 30 岁，贫病而死。两岁多的小妹妹不知道母亲已死，还爬在母亲身上要奶吃。你哭着把妹妹拉开，用绳把妹妹捆绑在炕上，一路哭着去找打工的父亲报信。七岁的孩子啊，半夜走过坟场，只见“鬼火”（实为磷火）闪烁，狼狗嚎叫，浑身直打哆嗦，还得摸黑前行。以后你多次梦到这恐怖场景，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父亲有病还得打工，你带着小妹妹在姑姑、大姨、姐姐家辗转讨吃。世上没有白吃的饭。七八岁的你必须上山打柴、下河挑水偿还饭债。呼啸寒风中，你稚嫩的双肩背着高过你半身的柴禾，几步一个筋斗，跌跌撞撞赶到亲戚家，冷饭也没给你留一口，小妹妹饿得直哭。小妹妹终于饿病而死，你抓起一领破席，包着亲爱的妹妹，哭着把她埋进村边坟地。你幼弱的手啊，无法把坑挖深。第二天，你去看时，小妹妹已被狼狗吞吃，你哭得昏倒在坟地。这些都是你我第一次长谈时告诉我的，你童年的悲惨深深震撼了我。

你从小好学，常在小学堂外偷偷听课。老师被感动了，让你上了一年学。你穿了姐姐一件蓝布旗袍上学，自然让同学讪笑。中午，同学都带了

饭来吃，你没有吃的，代同学做功课，人家送你半个窝窝头，你三口两口吞下去，“比吃奶油蛋糕还香”，你后来不止一次对儿女们说。你学习成绩最好，交不起学费还是失学。11 岁时，你打工的父亲全身浮肿而死，你成了孤儿，全靠自己谋生，给地主放猪放牛。占领东北的日军出外打猎，打死一头猪娃。管家无情的皮鞭打得你皮开肉烂。满腔仇恨强压在你心头。13 岁，你进抚顺日本工厂当了一名童工，受尽当亡国奴的屈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你挺起腰来，从奴隶变为主人。你立即参加抚顺工人纵队，配合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打了一仗。你参加辽东军分区、辽宁军区、东北军区，在极艰苦条件下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激战，曾经 50 天没吃过一顿热饭。战斗中你勇往直前，立功受奖，被保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你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抚顺和武汉三镇等战役战斗，英勇作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49 年新中国建立空军。由于你在陆军表现出色，你被调往第四航空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航校学员大多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而你只上过一年小学，一年军政大学，文化程度最低。但你顽强拼搏，在全班第一个放单飞。训练你的苏联教员最欣赏你，总夸你学习刻苦，勇敢，细心，悟性又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你随刚组建的空三师奔赴前线，先后担任中队长、大队长、团长。空战中，美国飞行员大都飞行过两千多小时，你们只飞行六七十小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你不惧强敌，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骁勇善战，第一次参战就一举击落两架敌机，首开全师实战歼敌纪录。以后你又首开全师击落美国王牌飞机 F—86 纪录，而

且也是一举击落F—86两架。空战中你共击落(7架)、击伤(两架)敌机9架,创空军击落敌机最高纪录,荣立两次特等功,被授予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你直接指挥的中队击落击伤敌机17架,创全师中队空战最好战绩。全中队五名飞行员,一级战斗英雄一名,二级战斗英雄一名,一等功臣一名,二等功臣两名,人人建功立勋,被授予英雄中队称号。

对这些战绩,你谈得很简单,往往几句话带过。你对我谈得最多的,是空战中牺牲的你的战友:团长孟进、大队长牟敦康和你的僚机范万章。你慨叹,是这些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你永远怀念他们。

泪眼朦胧中,我又仿佛看到从天津驰往北京的火车,列车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你和张积慧、刘玉堤等志愿军归国代表于1952年7月下旬来北京参加解放军建军25周年纪念。当时我是《人民日报》抗美援朝组记者,提前赶到天津,上了火车,便于抓到独家新闻。

我和你们同坐一个车厢,无拘束地谈了起来。刘玉堤二十八九岁,比较老练。你最年轻,二十四岁,最腼腆,话很少,脸上红扑扑地,热情中透出憨厚,严肃而又英俊。

火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欢迎的人群把你们抬了起来,学生们追你们到西单旅社,将你们团团围住,采访根本无法进行,不少记者干着急。我庆幸自己提前赶到天津,在火车上采访了你们,结合欢迎现场情景,我赶写了《人民热爱志愿军空军英雄》,发表在《人民日报》。

任务完成,我忙别的去了。意外地,接到你的电话,说总政决定你们三名空军代表要留下来向首都人民作报告,你们没有准备,你想请我帮你写篇报告稿。为“最可爱的人”服务义不容辞。我下午赶到旅社,和你谈了六七个小时,被你从逆境中奋起拼搏的勇敢和力挫强敌折服,更为你高尚无私敦厚朴实的品质感动,一个通宵赶写了六千多字的报告稿。第二天早晨交给你,你仔细看了,高兴地说:“想不到你出手这么快,不简单”,似乎很欣赏我的工作干劲和效率。

我们谈到生死观。我问你,每次空战,你都面临生死考验,你是怎样想的呢?你说,童年少年生活悲惨,活得艰难,犹如一根被践踏的小草,随时

可能死去,死得无声无息,死得毫无价值。参军后,懂得阶级、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价值,为阶级的解放而战斗,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战斗,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而战斗、牺牲,非常值得。作战多了,每次想的首先是如何消灭敌人,个人生死常常置之度外!

你的话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你水晶般纯净的心灵。我们彼此交心,互相吸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相聚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广场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歌曲,不少青年在翩翩起舞。你似乎被这种和平欢乐的情景迷住了,但你很快要赶回前线,投入战斗。你希望确定我们的关系。我担心恋爱会影响你的战斗。你毅然说:“决不会的,爱情只会给予我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去保卫你和祖国人民。”

我被你深深感动了。但从小坚持妇女独立、事业心很强的我还是提出“约法三章”:坚持记者工作,不能很好照顾家庭;不当随军家属;采访对象多半是男同志,希望你不要有大男子主义,要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我的工作。

你仔仔细细地听了,认真思考后,爽朗地一口答应,并终身承诺,一辈子支持我的工作,尽管这样做给你带来许多不方便。

1953年8月5日,我们在空军招待所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你和张积慧、王华清等六位飞行干部到苏联莫斯科空军学院学习。这对你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你只上过一年小学,一年军政大学,十个月航校,没有学过中学的代数、几何、三角和大代数,也没学过俄文,却要用俄文直接学微积分、高等物理、空气动力学《联共党史》、《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飞行指挥理论等正规大学课程,艰难可想而知。你又是超负荷地顽强拼搏,六个学员中你学习成绩最好,受到空军司令刘亚楼的表扬。

然而,过重的学习负担还是把你压垮了。1955年,你不得不回国治疗。1956年初,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给你动了手术,从你肺部割去鸡蛋大充满结核菌的肺癌。他极其高明的手术加上你坚强的事业心,终于使你手术后重返蓝天,虽然你的肺活量已失去三分之一。你在保定、涿县航校工作,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

我也经常出差,一出差一两个月。我们一年

相聚的时间至多几十天。你从不抱怨,还说,虽已结婚,仍过单身汉生活,吃饭在食堂,衣服自己洗,好容易周末回家,碰上我出差,还得“独守空房”。你怕我过意不去,又笑着说,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你是多么体贴和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呀!我内心充满对你的感激之情,为你无私的爱自豪。为有你这样体贴的丈夫而倍感欣慰。

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曾说,爱一个人,就要使所爱的人更高尚、更幸福和更快乐!你正是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这句名言。尽管这使你自己生活上有许多不方便。宝桐、宝桐,如果说,我能一辈子坚持十分辛苦、常常顾不上家的记者工作,有所成就,完全应归功于你牺牲了个人家庭生活对我的全力支持和终身支持啊!

我对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和首都女记协的女记者、女编辑讲课时,常说,一个女记者如果在事业上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位十分谅解、体贴和支持你工作的丈夫。我很庆幸有这样无私爱我和支持我工作的丈夫!

我永远记得,1956年我生第一个女儿,你赶到医院,给我送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玫瑰花。这在50年代可是件稀罕事。同房的产妇都用惊奇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分外甜蜜。1957年生儿子、1963年生小女儿,你都同样送来鲜花,同样给产房带来温馨幸福的气氛。我深信,只有始终热爱着妻子的丈夫,才能这样做。

我永远记得,1958年我30岁生日,你送给我一张精致的玻璃面书桌,让我在这可爱的书桌上更愉快地写作。你的关心多么细致、周到!你还用你那双操纵喷气式战斗机灵巧的双手和一颗挚爱的心,给我雕刻了一个寿星像,表面加上椭

圆形的凸面玻璃,里面镶嵌了我的小照。你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令我格外珍惜和感动。

你还拿了我1955年去浙江沿海大陈岛采访时穿军装的照片,到前门大街景德镇艺术瓷器服务部,从景德镇定做了一只精美的瓷盘,瓷盘上永远留下我27岁身穿军装英姿挺拔的面容。这瓷盘历经劫难,靠你细心保护,至今兀立在客厅书架上。

你感情细腻深沉,心灵手巧。每逢我出差回来,常看到我们的房间被你用心重新布置过了,显得更温馨更有诗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你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每当我出远门,你总帮我准备行装,还要帮我这个经常遗忘东西的粗心妻子检查一下,有没有遗忘什么。

1966年,我们已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你是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每逢你周末回家,星期天,我们总带着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北海或陶然亭玩半天,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兴奋和欢乐。你总惦记着给孩子们买玩具和小人书。十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他们的儿童书籍已装了一书架。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感情依旧如新婚时那么炽热。中国有句古话:“小别胜新婚”。我们常常小别,因而时时处在新婚般的甜蜜依恋中。

“文革”风暴骤起,一夜间,人民日报社被夺了权。“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人民日报



作者和赵宝桐(摄于50年代)

社工作组组长。我不是当权派,群众也没给我贴什么大字报,我在“红卫兵”监督下采访、写作。

你工作的航校也闹起来了,你很少回家,回家时我们忧心忡忡,关起房门讨论时局和国家大事。

张春桥派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鲁瑛来《人民日报》主持工作,他让我写一篇歌颂“第三代”(红卫兵)的文章。我采访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写了两个月,文章难以完成。

你知道我的难处,更了解我的脾气。你劝我:“你老写奉命文章,写不出来不要硬写,不要写以后自己看了会脸红的文章,不要赶时髦、赶潮流!”你是多么理解我啊。尽管鲁瑛一再催促,文章终于不了了之,使我避免了歌颂“红卫兵”的尴尬,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呀。

1967年1月,全国刮起“造反派”夺权之风。我到北京郊区怀柔县采访。一位副县长对我说,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如今全县机构瘫痪,无人管生产。如果农业生产垮了,老百姓是要挨饿的呀。我找了“造反派”,说服他们“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农业生产有人管了。

我写了一个直送中央的“内部情况”,周总理看了,立即送毛主席。毛主席让全文发《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成立了工业、农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业生产有人抓了,周总理很高兴,江青很恼怒,说总理是“用生产压革命”。

我到了湖北汉口,只见马路上一批批“保皇派”工人和劳模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游街,有位全国劳模还戴了顶铁帽子。我数了一下,足足有六千顶“高帽子”!这是湖南农民运动中农民对付地主的呀,怎么可以用来对付工人?!我提笔写了第二个重要情况,提出这样做严重伤害了工人群众。

这第二个情况也起了作用。“中央文革”下令,禁止“高帽子游街”、“解放了”一批劳动模范和工会干部。这让你我在愁闷中多少感到些安慰。

1967年9月,我到上海采访。驻上海空军部队的一位宣传处长找我,说他们“要用毛泽东思

想占领天空”。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想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在下达飞行指令前加上一句语录。这在当时打电话时是常用的。但若用在飞行指挥上,飞行员如一时反应不过来,会出现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我忍不住了,提笔写了第三个“情况”。这个“情况”触怒了吴法宪,前面的“情况”得罪了江青。

1968年5月15日,陈伯达下手令,将我关在北京卫戍区,一关就是五年。不许探望,无人过问。我在牢房以泪洗面,背熟了语录和毛选,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世界通史》。

你也受到空军审查,从佳木斯查到海南岛。幸亏你是三代贫农,历史清白,作战勇敢,实在查不出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但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下令,立即离婚,还让空军组织给你找个“造反派”对象。我在监狱一无所知,你没有到法院签字,“离婚”由空军包办,让一名干事代你签字。

你所在航校干部果然奉命给你找了十几个对象,你一一拒绝,顶了三年半。航校领导说,你再不结婚就是对王金凤还存在幻想,还在等着她,她也许早就死了!你绝望了,担心再顶下去,自己会被抓起来,三个年幼的孩子势必流离失所,落入你童年悲惨的命运。迫不得已,1971年12月,经组织介绍,你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1973年6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出狱了,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你向空军请假,要求到北京看望坐牢五年的我,竟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得到批准。一夜长谈,我完完全全谅解了你。我们同心协力,在十几个机关辗转奔走三年半,尝尽人间酸辛苦辣。你夹在两个女人中,处境比我更难。我明确告诉那位女士,我并非和她争宝桐,也不是宝桐抛弃她,而是反抗,反对“文革”造成的悲剧。她自然不理解。你既要坚持工作,还要花极大精力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你从北京回到锦州,立即住在办公室,和那位女士分居三年半。你还要竭力安慰我,三年内写给我三百多封信,平均三天给我写一封信。我自然也如数写给你。我将这些来信一一编号,似乎我们又重新恋爱一次。你心情苦闷,猛抽廉价雪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四十出头,两鬓见白。我的体重一年内下降六十斤,骨瘦如柴。两人

相见,凄然泪下。

1976年春天,锦州法院准备判决你真正自愿的离婚。那位女士上书江青,把你我要求复婚和所谓“右倾翻案风”挂在一起。江青大笔一挥:“慎重处理”。事情全部停摆。

你我一时陷入绝境。我的五年坐牢,由江青、吴法宪而起。我和你的重新结合,又被江青阻拦。我对江青真正恨之入骨。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仇恨,整个国家已被江青一伙拖入崩溃的边缘。

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终于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决你离婚。同一天,北京法院撤销错误判决,你我恢复夫妻关系。历经人间难以言喻的悲欢离合,我们和三个孩子终于全家团聚。对那位女士我们倾家荡产从经济上给她补偿,还在北京给她找到她满意的一位干部,重新建立家庭。

1978年,你调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们才结束长达25年的分居,生活在一起。这一年,我俩50岁,已达“知天命”之年。

我还是经常出差,你也常下部队。但你从部队回来,有我和孩子在家等着你。五口之家,其乐融融,这可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83年,你55岁时过早离休。你心情郁闷,设法排遣。悟性很高的你,用操纵战斗机的手,拿起雕刻刀,无师自通,创作了《飞行员之歌》《雄鹰展翅》《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堂·吉诃德》《北京猿人》等几十件根雕作品,形神俱备,栩栩如生,受到行家好评,你还当选为全国根雕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三个孩子在逆境中奋发自强,都是硕士研究生,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外孙和一个可爱的小孙子,给我晚年带来很大乐趣。

宝桐,人民没有忘记你。1988—200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夕阳红》《半边天》及阳光卫视、凤凰卫视先后拍摄、放映了你我的专题片,“东方之子”的题目就叫《永远的英雄》。在《开国英雄》《改革开放二十年》等文献纪录片中,也有你的镜头。新世纪开始,你还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几

百封来信。他们天真热情地“要向赵爷爷学习”,“长大了也要建功立业,报效祖国”。信中附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们亲手制作的小飞机、和平鸽、小星星和花结,有个孩子还起名“续航”,表示要努力继续你的航空事业。这几百封来信感动了你,让你感到后继有人,十分欣慰。

你一生从事飞行事业,热爱和关心中国的航空事业。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直飞太空,使你无比激动。你曾笑着对我说:“如果时光倒退25年,我可能成为宇航员”。我劝慰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要求和职责,你尽了你那个时代建立和保卫新中国的职责,不能奢求办不到的事。”你默然,依旧神往太空飞行。

去年12月12日你走后,许多同志到我家吊唁、慰问。我充分领受并深深感激这一份份深重的友情和同情,也完全明白节哀顺变的道理,但还是沉溺在深重的悲苦中不能自拔。宝桐,宝桐,你这辈子对我照顾得太多太多,我对你照顾得太少太少,“文革”中甚至牵累了你。想到这里,内心的愧疚、自责难以抑止,哀伤的泪水难以抑止。

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清华老学长杨绛先生1月9日灯下写信给我,杨绛先生信上说:

“料想你还沉浸在悲痛里,我非常同情。可是我的同情不能安慰你。据说,这种悲痛只有时光能治疗。(我也不大相信)

“你多才多能,可以找些你认为必需做的事,或难以办的事,或任何有价值的事,一纳头地忙去,你也可躲避一下,不让悲痛占领你。我也曾试过,有点用。”

杨绛先生的信写得何等好啊,她与众不同的开导深深打动了我。我要学会躲避悲痛,找些必需做的事,难办的事,有价值的事,一纳头地忙去。宝桐,宝桐,我深信你也会愿意我这样做的。

我从悲痛中站起来,抬起头来,放眼望去,你正在蓝天驾机远航,不,乘飞船直驰太空,往宇宙深处飞去!等着我,宝桐,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见!

(责任编辑 致 中)

## 更正

本刊今年第3期《忆赫润同志》一文最后一段倒数第6行(见64页)应为:“不久即被东北军阀抓去枪杀”。

# 理解六十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 袁鹰

林汉达师于十年浩劫中的 1972 年逝世，至今忽忽已有三十多年。我只在上海沦陷后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即 1943 年秋至 1946 年秋，从师受业，聆听训诲三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稀还在眼前，他的精神风范，更是终身难忘。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对教育改革的实践。

身处日本侵略者兽蹄践踏下的上海，当然没有民主政治可言。我们这些在抗日战争年代进入中学读书的青少年，一心只想到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当亡国奴。虽然知道“五四”时代思想界先驱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为长夜漫漫的中国高悬两盏明灯，但是离当时的上海似乎遥远而渺茫。什么叫民主，并不清楚。因此，汉达师在教学中对我们灌输民主观念，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他将这三条的原文“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整整齐齐写在黑板上，也深深嵌入我们的头脑里。讲了林肯，又讲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可更是闻所未闻了。这些内容，同他讲授的教育概论课程并无直接关联，但他可能认为现代文明的观念，其实正是教育的根本。中国古代大学者韩愈的名篇《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将“传道”列为教师任务的第一条，放在“授业”之上，认为传授真理是做人的根本。若是“道不正”，授再多的业又有何用？记得当年汉达师讲述林肯三大民主原则之后，还发了一通感慨。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中国现在根本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的统治，驾凌在老百姓头上，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就好像现在的上海。中国号称民国，英文称 People's Republic，可是老百姓连基本人权——生存的权利都说不上，还谈得什么别的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更谈得上什么民主！他这番话，对我们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尽管我们那时对民主政治只具有极其肤浅的认识。

1945 年 8 月日寇战败投降，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汹涌高涨，势不可挡。中国国内形势也进入新的时期。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做点民主姿态，装装门面，表示要适应世界潮流。邀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去重庆，重开国共和平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停战令，这些虽然都是对国际国内装装样子，也毕竟有一点民主气氛，尤其是上海这样有关国际观瞻的大城市。上海人民首先是知识界人士、学生和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发起下，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45 年 12 月，汉达师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几位先生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进步的教授学者文化人常有机会在上海各种集会上用各种题目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的前途，特别是呼吁民主政治，要求言论、集会自由，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林汉达、邓初民

等几位先生,隔几天便会出现在学生、工人、教师的集会上。我们在学校里不大见到汉达师,但常看到他出现在群众集会的讲台上。他演讲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宁波口音的普通话,特别受群众欢迎。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的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蟾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一是是非自有公论,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中山公园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他希望妇女“不做寄生虫,不做磕头虫,不做软骨虫。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那时人们的心理是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汉达先生将民主政治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讲得如此简单明白而又如此精辟透彻,当天另外几位的演讲者恐怕都是没有想到的。

汉达先生对中国旧教育改革的决心,我们从入学第一天就感受到了。他将自己的代表性论著《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发给大家。他并没有宣布作为必读课本,而是启发我们思考。他说这是他个人的主张,欢迎同学们讨论、批评,并且愿意同大家辩论。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我们对大学教授那种俨然不可冒犯的印象,同他亲近起来。教育系同学有不少本人就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很快就被汉达师的新鲜教育观点所吸引,认识到旧教育制度中观念陈腐、思想僵化、束缚儿童少年天性、限制自由发展的种种弊端,面前突然展开一片新天地。

汉达师改革教育的实践还可以举出两件实例:第二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教授讲课,而是组织同学分组讨论世界书局新近出版的一二十部话剧剧本。我当时自命为进步的文艺青

年,对汉达师的举措虽然感到新鲜有趣,私下里却不理解:为何不讨论30年代左翼新文学或者苏联十月革命初期作品,却来读那些带有洋味儿的喜剧?不少同学却都很有兴趣,讨论时气氛热烈。汉达师有时也坐在我们中间,随意发言。前些年我偶然读到杨绛先生为她当年两个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重新出版而写的后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可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读到这几句,我忽然想起当年在教室里讨论那批喜剧时的情景,大家高高兴兴,似乎完全(至少是暂时)忘却了教室外的黯淡岁月,也就体会到汉达师当年用心良苦了。

有一个学期汉达师为我们教育系开了一门“新文字”课程,请一位北京来的齐铁痕先生讲授拉丁化新文字。上第一课时,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本人那几年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启蒙读物的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身穿蓝布长袍,足登平底布鞋,很有京派学者风度。他费了许多工夫,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籍学生弄清Z、C、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训练我们熟悉“国语”的准确发音,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今天,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开始学汉语拼音,而60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讲授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大后方甚至陕甘宁边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天回想起来,更加敬佩汉达师这位教育革命家和革命教育家的创见和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文字是革命的左翼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很有可能招来缧绁之灾以至杀头之祸的。

哲人其萎,典范长存。我们现在正是强烈地呼唤民主政治,也正是深深感受教育改革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多么重要,缅怀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林汉达师,更加感慨无际。

(2004年1月)

(责任编辑 方明)

# 兼具学者风范的好领导郑惠

● 徐庆全

今年2月23日,是郑惠同志逝世周年忌日。

犹记得,在2003年2月24日知郑惠同志去世的消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住院时,我曾前去探望。虽然我知道他是肝癌,但从他仍旧谈笑风生的情形看,这病魔似乎与他不相干。他在医院里不仅依然读书写作,而且完成了他早想完成而因时间所限没有完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所以,从医院出来我还向关心郑惠同志的同志们讲,郑老没有事,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曾想,2月23日凌晨,郑惠同志竟然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

从1996年以来,我有幸成为郑惠同志的部下,得以亲炙,身受熏沐有四年多。现在,郑惠同志逝世一年了,以往所感受到一切重又浮现脑海。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著名学者高风亮节的品格和严谨求实的学风,理应让学人知道,让世人忆念。

## 从“识”文到成为部下

郑惠同志是1948年就参加革命的我的老老前辈,先后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参与了很多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像《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等。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上,郑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一章的撰写和修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主要统稿者。当然,这些我是在成为他的部下后才知道的。在此之前,我是通过读他的文章“认识”这位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的。

1995年1-2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郑老的《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在文章里,郑老详细介绍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并夹叙夹议谈到了自己的认识。在文章的结尾,郑老写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今天的巨大胜利与“文革”的严重失败相对照,使我们更加相信党和人民在新时期所作的历史性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前进的征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谈话和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认为这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回顾这十几年的经历,这个结论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的。

1995年,正是几个“万言书”流传很广的时候,郑老这样写,显然是有其针对性的。而他在文中所用的“流风余韵”这个词,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传神地刻画出一些抱着“文革”不放的一些人的心态。读后真佩服作者用词之考究。

到今年年底,我代表《炎黄春秋》参加由四家杂志社联合发起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征文活动,在一次会上,才算真正见到了他。

那时,郑老是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正拟筹备《百年潮》杂志的创刊工作。他参加了我们的会,在谈了对这一活动具体的组织意见后,也谈到了准备筹备杂志的想法。他谦虚地说,在



座的都是办杂志的，我们这份要筹备的刊物，还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他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春夏，为了筹备刊物，在郑老的支持下，邀请了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和刊物的编辑，开了几次征求意见的会。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的推荐下，我也有幸被邀请。郑老的平和与谦虚，使几次会议开得很活跃，大家都对这份酝酿

中的刊物各抒己见。我也根据自己当编辑的经历，谈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这样一来，我这个晚辈后生也得以与郑老熟悉了。

在此期间，魏久明秘书长找我谈话，想把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我当然很愿意。我学的专业是古文书研究，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才转到党史方面来的，很希望得到专业的训练。后来，由于我自身的因素，调动搁浅了。郑老得知后，对我说，你到我这来吧，干一段时间再谈调动的的事情。这时，郑老筹备的刊物已经定名为《百年潮》，他自任社长，开始搭配编辑班子了。这样，从1996年7月开始，我以这个杂志的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开始参与筹备《百年潮》的创刊工作，正式成为他的部下了。

## 严谨求实的学风和豁达待人的高尚品格

在经有关方面审定的《郑惠同志生平》中说：“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能诗能文，讲究辞章”，“乐观豁达，平易近人，奖掖后学，关心、爱护和扶持年轻一代，深受中青年理论和党史工作者爱戴”。这是对郑惠同志高尚品格一个方面的评价。对这一评价，我有真切的体会。

郑惠同志多次参与起草中央文件，自然是大



胡绳(中)龚育之(左)与郑惠在一起

手笔。与他接触，使我不能不为他的“治学严谨”所折服。他为《百年潮》写的文章，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几稿了。

2000年2月，郑老从社长位置退下来后，有了潜心著述的时间，他以回忆与胡绳同志的交往为主线，写出了系列的介绍胡绳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考的文章。文章夹叙夹议，生动感人，很受读者欢迎。我作为负责编辑发排的工作人员，总是能较早地先睹为快，也总是渴望看到他的稿子。在对稿子的处理上，他每一个校次都改，甚至到我在厂里出片子时还打电话来改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后来翻阅他的《程门立雪忆胡绳》文集，我仍然发现他在发表的基础上又有多处改动。可见其为学为文之严谨。

郑惠同志把这种“治学严谨”的学风也带到了编辑工作上。他对每期刊物的每一篇稿子都仔细阅读，并亲自当编辑。每一期刊物有十二三万字，他从一校开始看，三个校次都看。且不说在选择这十二三万字的稿子之前他看稿子的数量，单就这三个校次，意味着他一个月要看三十多万字的稿子。这对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来说，如果没有严谨的治学作风，是难以做到的。这种学风，用“生平”所说的“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八个字，是远远涵盖不了的。我的体会是，郑老是用心血浇灌着《百年潮》的成长啊！

初次到郑老手下时,我很难适应他的这种治学作风,对他这种改中央文件一般的编辑风格也不以为然。为此,还曾经把这位我所尊敬的笑眯眯的平和的老人惹火了。至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有深深的愧疚与负罪感。不过,从这件事,则可以看出郑老“乐观豁达、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

有一次,在临近出片子的时候,我在工厂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完成并签字出片。郑老打来电话,要对一篇文章的某些字句作一些改动。当时,我竟然一口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并不冷静地说了一大堆理由。我把老人激怒了,他见无法说服我,就生气地挂上了电话。熟悉郑老的人都知道,这位平和的老人是不轻易发火的,而我竟然将他激怒了。这且不说,我竟然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见我性格之顽劣。第二天,杂志社的一位同志对我说:郑惠同志说,他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杂志创刊以来,你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也是很辛苦的;家里人也为之付出很多(我的孩子还小)。今天晚上郑惠同志让你带上夫人一起吃个饭吧。我听后心头一热。本来是我错了,老人却这样宽宏大量。那次吃饭,郑老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谈了工作的不易,并关切地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本来想借此机会给老人道个歉,但在这种气氛下,始终未曾说出口。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 退位

2000年2月,郑老从社长位置上退下来了。他本来还可以接着干的,但终究还是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因为了解他辞职的原因,我不禁心中黯然。

杂志社为郑老吃了一顿送别的饭。回家我搭



他的车,看着他满头白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往日的一切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闪现:

郑老是大学者,“言钱”、“言利”的事情本与他无关。可是,为了杂志的生存,他多次以老迈之躯,疲惫的面容去应对投资和发行者。

由于坚持了“求实、求真”的原则,《百年潮》出刊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流风余韵”在作怪,这一办刊宗旨也并不为一些人所认同。另一种评价也不时有所耳闻。对此,郑老的态度是,有益的、积极的建议我们听,并改进我们的工作。办刊的宗旨不能

变。那神态,也不再是笑咪咪了。

为这个杂志操碎了心的老人,面对如此结局,如何作想?在车上我没有问,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问。

参加郑老的遗体告别仪式,我看到有关方面审定的《郑惠同志生平》中写道:“郑惠同志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倡开阔视野,独立思考,并身体力行。”

这是对他一生政治方向的肯定,当然也是对他《百年潮》正确办刊方针的肯定。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沈约悼念魏晋大诗人谢眺的诗句: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  
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  
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  
尺璧尔何怨,一旦同丘壤。

谢眺历经磨难,英年早逝。郑惠同志虽然不能说是英年早逝,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很多工作啊!

斯人已去,忆念永留心间!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官场痼疾—— 承望者现象

● 官伟勋

## 什么叫承望者现象？

简略地说就是揣摩当权者的心思，说他想说而他自己不便于说的话；做他想做而他自己不便于亲自做的事。有的辞书注“承望”为“料到”，有点意思，但太简单，不足以概括古人说这个词的全意，故以“承望者现象”名之。

不就是拍马吗？不全是。通常说的拍马固然也有承望之意，但大都属很低级的那种，反映不了“承望者现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拍马只能算“承望小儿科”吧。

“您的报告真是太振聋发聩了！”“深受教育！深受教育！听您一次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像您这样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有您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幸福！”之类，“承望者”一般是不屑于干的，认为俗，而且碰上精明点的当权者会适得其反。

我们山东老乡、在明朝官拜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在他的《谷山笔麈》中就生动记有拍马出洋相的实例。

严嵩独揽大权时，他儿子严世蕃靠老子当了工部左侍郎（今副部长）。他这个副部长不仅不同于一般副部长，就是部长、副首相见他也得礼让三分。他老子是一把手，他也就是一把手。加以严嵩年龄大了，急于培养儿子接班，所以许多重要文件就让他批。那些跑官的自然就如蝇逐臭般来巴结大公子了。

这天来了个跑官的，刚坐下，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严世蕃放了个屁。该客立即扬起脸，鼓起鼻翹使劲闻了闻，故做欣喜状：“哪来如此香气？”

严世蕃是公子哥，见拍马的见多了。他既喜欢人家拍，觉着舒服；又狡黠刻薄，爱捉弄人。听夸他的屁香，立即装做吃惊的样子“啊！”了一声，说：“刚才是我放了个屁。屁该臭，怎么香呢？是不是我的内脏出问题了？”客人吓了一跳，拍马拍在马蹄上，赶紧又扇动鼻子使劲闻了闻说：“倒也有些异味！”（原为文言，今译白话）可怜的家伙！尽管吸了一肺权贵者的屁，也不敢说个臭字。

“承望者现象”的当事人可就不是这等水平了。承望者的特点是：用意深，着眼远，措辞高，手段隐蔽而且出手狠。这里说的狠，既指整人整的狠，为了讨好上头，必要时敢置人于死地；也指用上纲上线掩盖祸心的手段高，令人明知不对却难以反对。

## “承望者”一词的出处

该词笔者初见于明朝李乐的《见闻杂记》。为准确介绍原意，照录原话如下：

张江陵在朝，气焰凌人。意欲所为，不必面嘱，亦勿烦作书（欲人办事，用不着写信或写条子），承望者悉逢迎为之（承望者会主动猜测他的意图去做），杀人求媚，不可胜记。其最惨者有吴士其，南直隶宁国人曾上书谏（讥讽）江陵，而当事者（指承望者）又不欲以杖死显示人，令狱卒绝食饮。数日间，乞食不得，饥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咬木柱、窗楞，痛惨倍极死！恣行法外之诛戮，忍伤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惨烈如此者！

这里说的张江陵，就是明朝有名的政治家张居正。张是湖广江陵人（今荆州），所以人称张江

陵。历史学家一般对他都是很肯定的。权威的评价是：“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前后当国十年，推行改革。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都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病死。死后被弹劾，尽夺官职。”（《辞海》）这个概括很简略，主要政绩说到了，“死后被弹劾”一句，则含蓄地显示了他的某些问题。

明熹宗朝给他“平反”恢复名誉，已是四十年后的事了。

张居正是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治国成绩卓著。他那么能干，对国家贡献那么大，而且在用人上还有许多超凡见解，所谓“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为之尽”；“任用的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等等。为什么如此精明的一个政治家，会允许部下不惜以惨杀正人君子的罪恶手段来讨好他，他竟然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呢？问题出在哪里？综观他的全部历史，细看他一生作为，不难发现，首先还要从他个人的政治品质上找原因。

## 苍蝇叮有缝的蛋

张居正确实能干。有见识，有魄力，有组织能力。但他有个大毛病，就是私心太重，太贪权，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玩弄权术徇私枉法，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他的贪权固位，有张瀚的《松窗梦语》实录为证。

张瀚是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嘉靖十四年进士。曾官工部、刑部部曹，庐州知府、大名知府，后又长期担任多省委员与巡抚、总督等职，被称为“明朝得力官吏”。张居正调他担任有“朝中第一官”之称的吏部尚书。当时“清流”议论这项任命是张居正拉帮结派培植亲信。

不料，张瀚正是在吏部尚书这一关键岗位上，因“夺情”案得罪了张居正，“被勒令致仕”的。在他事后写的这本书里，如实述说了被罢官的过程：

张居正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给吏部写了个条子：“某日闻讣，请查照行。”（按照制度，父母

去世，官僚都要回家守制，以体现“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作为首相，他当然熟知这个制度。遵制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吏部查根据？原来前朝曾有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的故事。张居正显然是暗示吏部引用这一根据留他继续执政）。张瀚装做没领会其中的意思，把条子转给礼部“查复”。礼部回了个“查节年阁臣丁忧恩典，从重优恤”。这是个根本不着边际的意见。这哪里是张居正想要的？等于催张赶快下台上路嘛！因而，“乃大拂江陵心，唆台省数人相继弹劾”，张瀚就被弹劾掉“奉旨致仕”了。张瀚临走前进殿朝北磕了头，出来见张居正告别说：“我滥竽充数，有幸做您的下属。见您接到讣闻哽咽，哭的很伤心。我以为您难过之极，急于奔丧尽孝。区区之心，实在是想为公效力。没想到弄拧了！”张居正听了他的话，汗满额头，“噤不能声”！张瀚拂衣而归。有人送他一诗曰：“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

在这件事上，不少官员因弹劾张居正“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找他为众官求情，他竟然把刀架在脖子上，大怒道：“皇上强留我，诸子却要极力赶我走！这不是要杀我吗？”御史刘台弹劾他，措辞尖锐，张居正竟跪在皇帝面前怒辩，“泣不肯起”。直到小皇上把刘台“除名为民”才罢休。上边说的吴士其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整死的。与别人不同的是，吴士其写告状信冒用了海瑞的大名。而且假造并传播一份“圣旨”：罢掉张居正，起用海瑞。民间欢欣若狂，奔走相告。张居正的脸面尽失。

《松窗梦语》披露的另一件事，是张居正为儿子干的丑事。

甲戌春，张瀚奉命“入闈进士廷试卷”。当时张居正“柄国”，因他儿子也在廷试之列，所以“避不阅卷”。副首相张蒲州选定名次。一甲三名（没有张居正的儿子）；张的儿子被选为二甲第一名。按规矩，给皇上先念一甲的，皇上依次听了就算定了。张居正“潜通大太监”，把他儿子的卷子放在一甲第一名的位置。结果他儿子张嗣修当选一甲第一名。事后张居正还对张瀚不满地说：“张蒲州是我提拔的，竟舍不得给我儿子个一甲！”而在这之前，张居正向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打招呼照顾他儿子的事，早已在社会上传得纷

纷扬扬。海瑞听后,给吕调阳写了封信:会试应讲公道,您必然不会“私徇太岳(指张居正)”,太岳也会以公道自守,必然不会以私干公也(大意)。海瑞的信写得已经够婉转客气了,但还是得罪了张居正。当人们推荐海瑞调朝廷(中央)任职时,吏部“承望”张居正的心意,批了个“海瑞秉忠良之心,抱骨鲠之节,”确实是好官,但在下面干的很合适,不宜调朝廷加重他的负担(大意),拒绝起用。先受高拱打击、后受张居正排挤的海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得复出。呜呼!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年迈体衰而且多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张居正煞费苦心为儿子谋高官,结果如何呢?他死后被弹劾,家产被抄。大儿子张敬修因受酷刑自杀身亡。二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张居正父子的结局,以及严嵩父子弄权垮台的事,值得所有贪权而又护犊情太浓的高官引以为戒!

其实,孩子有出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让他自己奋斗,会更有前途。没出息,靠老子授以要职,犯众怒不说,早晚还会闹个“因嫌纱帽小,反把枷锁扛”的可悲可鄙的下场!

## “承望”风的顽强生命力来自千百年的旧体制

承望风的猖獗,有被承望者本身“破蛋缝”因素,更有中国社会大环境这一根本因素。

在一个封建专制官本位的社会里,惟有做官才能出人头地,才有荣华富贵。做官成了最广泛的人生追求。

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当大官,当上大官想老在大官的位子上牢牢地呆着,生怕被取而代之。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心态!功成身退如范蠡、张良的很少很少。

正是这种普遍心态制造着一出又一出承望与被承望的连续悲剧、喜剧、闹剧、丑剧!

靠兢兢业业真本事上去的,有。但不能否认,有相当一些人,则是相信“善士不如机遇”,机遇不如关系,踏踏实实不如投机取巧,因而靠走邪门歪道上去的。邪道怎么走?巧施承望术就成了这种人的最佳而且成本最低廉的选择。不需多少投资,用手头的资源就够了。上边说的那个整死



张居正像

吴士其的“当事者”,一个钱没花,只向狱卒交代一句:“什么也别给他吃!”就足够得到赏识了。

承望的机会处处有。见顶头上司盼望百尺竿头再升一步,就帮上司造“政绩”造“舆论”,利用职权给上司拉选票;见上司恋栈,就慷慨陈词,以国家以大局以及“群众强烈要求”为由“集体”挽留;见上司想安排老婆孩子,就一板正经地倡导“内举不避亲”,“破格”授以要职;见上司喜欢温柔乡桃花梦,就精心周密提供柔情服务,而且保证安全……多了!一些离退休多年的老同志听了,瞠目结舌:“真的?”很难相信是真的。

承望风是一种恶风。容忍它,它会滋生蔓延,盘根错节,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党势力。一旦形成朋党势力,问题就严重了!

要彻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既需治标,更需治本。体制上人事制度上的旧影响不彻底解决,承望风就总会与世长存。但也不能单纯等待制度的完善。与治本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舆论的力量,尽可能把承望风搞臭,形成一种人人蔑视人人抵制承望风的社会氛围。如果人们能把搞承望风看得像过街老鼠一样,我们的政治环境就会更清澈,更健康。我们就会更轻松更顺利地前进!

(责任编辑 致中)

# 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

● 章立凡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别是古博士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究应采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

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对国人影响有限，敲过开场锣鼓，还得让本国的学者名流唱戏。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 20 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話，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下转 72 页）

# 孙中山主动接受新闻监督

郑连根

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新闻事业,早在兴中会成立以前,他就进行过积极的报刊活动,并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报刊在开启民智、阐述新理论及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他主张中国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大办“学会”和“学报”,以“推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工作,他还亲自撰写《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之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始终以国民公仆自居,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认真接受舆论的监督,平易近人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对报刊在民主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鼓励报刊在共和建设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特别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的责任,他说:“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

最能体现孙中山先生和南京临时政府恪守言论出版自由原则的,是撤销《民国暂行报律》事件。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鉴于《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法令已随清政府垮台而废弛的现状,颁布了一个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其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员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其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坐以应得之罪;其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

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这个报律,单从加强政府对报业的管理的角度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报律颁布之时,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多未制定,民国究竟有无必要单独颁布报律,立法机构尚未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府部门就擅自颁布法律确属越权行为。再加上这个报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及量刑标准都很模糊,极易被误解和滥用。因此,这个报律电文发至上海中国报界俱进会并令其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时,立即遭到了新闻界的普遍反对。3月6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启民爱国报》、《民报》等诸多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抵制《民国暂行报律》。报界的联合通电称:“今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次日,上海各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文章《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再次阐述电文观点,并对报律条文逐一加以批驳,说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导恶政府之覆辙”,文辞极为尖锐。

孙中山先生得知此事后,于3月9日下令撤销了《民国暂行报律》,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民国此后应否设计报律,及如何订立

之处,当俟国会会议决议,勿遽亟亟可也。”

由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积极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较清末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个时期的新闻人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总统。中国的新闻人还成立了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广州报界公会、贵州报界同盟会等团体,代表报界就“报律”,新闻邮电费、报纸和报人权益等问题与政府机构交涉。在这种大气候下,除革命党外,“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旧官僚甚至是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民国初年的一个短暂的时期都摆出了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当时袁世凯的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接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出面接待新闻记者的采访。独立各省新成立的政权机关也都在所颁布的纲领性法规中列入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文。如《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中就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四川军政府在《独立协定》中也写上了“巡警不得干涉报馆”的规定。其余的如《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军政府临时约法》等也都载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还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一,为了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四川都督府每次开会时都要在旁听席上为女记者用红布围成一个女记

者室。其二,省内外往来电文,可以发表的,都油印得清清楚楚,分送各报馆。这种做法跟后来动辄对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封锁”、“资源垄断”等封杀手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孙中山先生坚持贯彻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从武汉起义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前,中国的报纸数量剧增,据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增加到500多家,总销量达4200多万份,创下了历史新高。纵观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闻事业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极大。政治开明,执政党和政府坚持贯彻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新闻事业就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反,如果政治黑暗,执政党及其政府以专制主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重创。国民党(同盟会系国民党的前身)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重视新闻事业,坚持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中国的新闻事业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他以“乱党报纸”为名对异己报刊进行大清洗,疯狂迫害报馆和报人,中国的新闻事业就又遭遇了挫折:许多报人被害,报刊数量锐减,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只剩下了139家。1913年是中国农历癸丑年,所以人们又称袁世凯此次对报业的摧残为“癸丑报灾”。

(责任编辑 吴思)

(上接70页)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宦和汤芑铭

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

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2004年2月28日 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重视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的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很注意招揽贤达,来维护其统治,他又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并利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好名重节的情操,对张季鸾礼遇有加,视为“国士”,甚至不计较张对他的责难顶撞;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恩图报,善始善终。

## 一、士逢知己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是1928年在河南郑州。

是年6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22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民国宿将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偕冯于7月1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在这里,张又意外地遇见了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经冯、张、邵、陈的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恍然面悟”。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张读东京第一高校,蒋读士官学校。蒋张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的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来,辗转奔波。蒋介石对张季鸾印象颇深的是张曾在辛亥革命后《民立报》《中华新报》当记者时,为披露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蒋很钦佩张的热胆忠肠。但有几件事又使蒋尝试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舆论阵地的重要。

其一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当年4月29日,张季

#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田斌

鸾写出《党祸》的社评,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的反动行径,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张季鸾写的这篇社评,博得了社会上的称颂,也使蒋介石名声扫地。

第二件事是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写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的社评,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这些话说得蒋介石怦然心动,颇有同感,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蒋佩服张季鸾的过人眼力。

第三件事是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次日,张季鸾很快写了一篇《蒋介石之人生观》的社评,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张季鸾与蒋介石不“骂”不相识。相识后,在他们的特殊交往中,又相处得若即若离。蒋的“文胆”陈布雷曾说过: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除了张的文采出众,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外,是蒋“爱乌及屋”。蒋对陕西人印象颇好,是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有些学生的“卓著才干”所形成,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和张耀明、刘玉章、胡璉、高吉人、张灵甫等陕籍将领,他们曾追随他鞍前马后,南北征战,或统领大军,喋血沙场,为蒋家王朝的统治尽了力尽了责,且“忠心不二”。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

## 二、坐在首席上的贵宾

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但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

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查阅。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友好，对《大公报》的寄托逐渐加深。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了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各家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论当时在全国报界的资格和发行量，《大公报》还不算太老太大，但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百官，人们当时看到，在蒋介石坐的首席桌上，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年国家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的五十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季鸾致电祝贺，并派专人送礼慰问。自称“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具有报恩主义的张季鸾面对如此礼遇，对蒋还能再说什么呢。

### 三、西安上空飘洒的公开信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图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回报。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军阀割据，混战交织，人民饱经战乱之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的事业才可达成。这既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国内任何党派组织（包括共产党）都不可能把握全国的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

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1936年冬，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得知后，“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记者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张的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更具奇特的是，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事变刚发生，就提出了“善后”。这表明了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张季鸾为蒋分忧，且笔耕不辍。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12月18日，张季鸾又写出了《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写到：“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文章一发表，蒋夫人宋美龄立即派出飞机，带了数万份这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散发。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12月25日晚六时，《大公报》社传来了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的消息，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张季鸾就写出了《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的社评。称这是“普天同庆、全国欣喜”的盛事。自此，张与蒋的个人关系已加深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能胜过的地步。据说与蒋介石敢平起平坐，去蒋官邸事先不须通报的只有几个人，而张季鸾当属其中。抗战初期，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先与德国人陶德曼进行斡旋，后又受蒋指派去香港与日本人接洽。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周年之际，张又为蒋起草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的文告，为蒋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次年，张又为蒋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文章，陈布雷在文中添上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另，张季鸾于《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揭露日寇、鼓舞斗志的好文章，且大都从维护以蒋

为首的国民政府利益,团结各方抗日这一基调出发。这些使蒋介石深刻感受到了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

#### 四、并非都是和谐

《大公报》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朋友,是张季鸾独立办报,不盲从,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的结果。

30年代初,在当时国民党的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打发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间,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上,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就是在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了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的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和《陕北共勉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稿件寄回后由《大公报》连载,此举像寒夜中的一束火炬,照亮大地,像一声春雷,震撼人心,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名声大振。1935年《大公报》又登出了范长江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把正在南京的张季鸾叫到他的官邸大骂一顿。这是张与蒋较为明显的一次不和。

在抗战期间,张季鸾还有联苏之想,早在1931年,他就派记者到苏联采访,多次报道苏联经济建设情况,希望中国有所借鉴。1940年,他又向蒋推荐邵力子担任驻苏大使。张的这些言行,与蒋不很和谐。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41年5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

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张季鸾在著名的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应该说张季鸾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具备着报人的敏锐和远见卓识。张的这些话既是提给毛泽东的,也是说给蒋听的。而且张季鸾的过人之处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

#### 五、“握手犹温”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张的逝世,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社会各界迅速作出反应,整个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

9月5日,得知张季鸾病危的消息后,蒋介石亲自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的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泪,呐呐数语,眉宇重凝,一往情深。9月6日凌晨,张季鸾撒手而去,走完他53年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张逝世后,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莛闻殒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的“握手犹温”一句是说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的情景。

9月26日,《大公报》社暨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会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前往吊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前往吊唁。张的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各界前往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素车白马,极尽哀荣。灵堂中央,还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

次年4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3000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临大会致祭。蒋很少出席这样的祭奠仪式,这次特由川到陕,千里迢迢,更说明蒋与张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张季鸾与蒋介石之间的交往,有恩有怨有始有终。张季鸾对得起蒋介石,蒋介石也对得起张季鸾。  
(责任编辑 吴思)

# 徐继畲： 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 郭锦华

1997年5月15日，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完成150周年的仪式，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前的南草坪举行。仪式的首倡者、美国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Professor Fred W. Drake）介绍说，当年，建造华盛顿纪念塔的时候，美国的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起摘录了徐书（《瀛寰志略》）关于华盛顿的十分重要的段落，雕刻到花岗岩上。如今，此碑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处。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Director Ezra F. Vogel）说，第一，从徐先生开始，中国不仅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而且重视处理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二，徐先生是中国内地山西省人，到沿海做官后，对西方的认识才发生变化。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沿海和内地的人对一些世界事务的认识往往差别很大，这是值得深思和注意的。第三，中美关系时好时坏，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能借鉴历史的经验，中美关系必定会更加密切。第四，徐先生对华盛顿推崇备至，原因之一是中国当时刚刚遭受鸦片战争的失败，徐先生为华盛顿这样一位打败英国的英雄而受到极大鼓舞，说明他有高度的爱国主义。

此时，华盛顿纪念塔前的南草坪，就像一个超越时空的平台，把历史与现实拉近，把东方与西方拉近，其镜头的焦点聚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徐继畲身上。

## 徐继畲的思想和政治生涯

徐继畲，号松龛，字健男，山西五台东冶人。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江南两道监察御史、两广盐运使、福建巡抚等职，累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文馆总理事务大臣。

鸦片战争前，徐继畲就对鸦片的泛滥深恶痛绝，主张严厉禁止。他在《禁鸦片论》开篇即指出：“鸦片之害，食货之妖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徐继畲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台。他力主抗战，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反侵略战争。厦门失守后，他寝食不安，断定夷情叵测，事无了期，要竭尽全力，与漳州共安危、共存亡。当他亲眼目睹清军屡被敌人挫败时，心如刀绞，为之“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既敬佩捐躯将士们的民族骨气，同时又看到了由于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的事实。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接连升职，在他任福建布政使时，道光帝召见他，并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通行事务。一方面，他严厉谴责英夷的侵略恶行；另一方面，他从切肤之痛中意识到，要走强国之路，就要冲破闭关藩篱，真实地了解世界。1842年初，徐继畲给山西的老友写了

一封长信,对西方的威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分析战争的起因、英夷的特征、失败的原因。他把英国人称为红毛中强大的种族。他们占据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他们的船只坚固庞大,大炮猛烈。清朝初年,英国人已经来到广东贸易,逐渐运来鸦片毒害华人,骗取中国的银钱。“逆夷”给有“二百年全盛之国威”的清王朝带来极其严重的麻烦。然而,耗资巨大的中国国防却不能拒英国人于国门之外。徐继畲清醒地认识到,掌握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信息,势在必行。西方人已是中国人不能继续漠然视之的外国人了。

为了了解西方,徐继畲“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搜集资料,并“披阅旧籍,推敲考订”,经过“五阅寒暑”,数十易稿,辑撰成《瀛寰志略》十卷。这部书被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称之为“海国破荒之作”,打破了“天朝上国”的一统天下的思想桎梏,启发并帮助人们开眼看世界。

##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地理,进而探究世界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这部书充分体现了徐继畲开放的文化思想。

### 1.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中国自先秦两汉至于清,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而视四裔邻邦为夷狄,国人对西方世界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就连注重实学的明清学者顾炎武、清末政治家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也所知不多,以致在地理上犯了“舛东西之界”等错误。顾亭林(即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把佛郎机国(法兰西)列于“交趾(安南-越南)西南夷”一类,以为其地“在瓜(瓜)哇(岛)(又称“噶罗巴”)(南洋大岛-现属印度尼西亚)南”。林则徐最初也并不熟悉夷情,曾相信有关蛮夷之国之类的无稽之谈,仅以为夷人需要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双目失明或患肠胃病等。后来,由于虚心探究,才逐

渐对西方有所了解。当时,就连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也“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以长槌击其足,应声即倒。琦善因访知英国国王自行择偶的消息,向道光皇帝启奏,断定英国是“蛮夷之国”,“未知礼仪廉耻”。

徐继畲首先从西方地理学获取全新的信息,重新认识世界,并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瀛寰志略》开篇,展现给读者的就是一幅“地球平圆全图”,并写到:“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徐继畲基本接受了将世界分为四大洲的理论。他说:“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曰亚墨利加”。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明确指出,中国在亚细亚之东南,所占之面积,“固不止得其半也”,即亚细亚之中最大一



徐继畲(1795—1873)

国。他已在地理学意义上确认,中国仅是世界版图中之一国。这对“天朝上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无疑是一种挑战。进而描述美洲谓“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同时,他已肯定英国、法国和俄国均是世界中的强国。这是对西方世界几个强国概略而合于实际的描写。

## 2. 正视西方强国的物质文明

《瀛寰志略》对西方强国发达的工商业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徐继畲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他在讲到法国时说:“所织大呢羽缎皆精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其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其造钟表之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介绍英国伦敦“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阙巍峨,规模闳钜……街衢纵横贯穿,百货山积……又大肆曰北明翰,铁工聚焉……埔头最大,每岁别国商船,来者千余,本国出入者三千余”。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所造之兵船,置炮多而精良,船体固而易驭,“不畏风浪”。徐继畲对美国的介绍着墨更多,分别描述了二十六州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例如,描绘“麻沙朱色土国”(即马萨诸塞州)的“摩士敦”(即波士顿),“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闾溢……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

徐继畲已经认识到西方诸国致富致强的基础,就在于努力发展工商业。他在《瀛寰志略》中写到:“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他在分析英国所以富强之由时指出:“英吉利畚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而进行殖民贸易之结果。

同时,他也认为英国本土工商业之发达亦是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述及苏格兰时,他说:“其民习勤劳,善于谋生……商民遍四海,积资多在数万外。故地虽寒瘠,而多素封。”美国东北部,由于有三大通商码头,所以“富商大贾之所聚,地虽偏小,气象固殊。内地各国,皆资耕作,幅员虽广,而财力不如海滨之盛”,等等。在沿袭古老传统“以农为本”的中国,徐继畲直言不讳地称道以工商致富的西方诸国,其实质是对中国重农抑工商政策的一种批评。

## 3. 借鉴西方强国的民主政治

《瀛寰志略》对19世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与肯定,特别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徐继畲还以推崇的笔墨赞赏美国的民主制度,称赞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畲宣扬这种变革性的政治制度及其先进性,正是同中国“公器付之一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瀛寰志略》中还告诉国人,中国文人理想的“桃花源”式的社会,在西方瑞士国出现了。在那里“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是“西土之桃花源”。而中国历代帝王将相无不实行徭役、苛捐杂税,并把“轻徭薄赋”当成最大政绩。这里作者显然在暗示,西方“蛮夷”的现行制度,要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制度先进。

国家政体制度要靠统治者建立和实施。《瀛寰志略》在介绍米利坚时,用了大段篇幅颂扬米利坚总统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可见,其中“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体制,较之中国封建皇帝的“传之一世乃至千万世”的体制为优;“几于天下为公”的政治局面,较之中国君王的“以天下为家产业”的政治观念和现实先进得多。

《瀛寰志略》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作者自称是“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叙述和评论招致了封建权贵的弹劾讨

伐,就连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但是,无论持赞同观点的睿哲还是持反对观点的官僚,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注意力已被《瀛寰志略》拉向了外部世界。

## 徐继畲的启蒙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龙夫威在研究徐继畲的论文中说:“当研究徐的经历,在透视他的生活和时代的细节过程中,我开始领悟到另外一些因果联系。我很少用预先设想的历史解释,而是把他经历中揭示和影响进程、前途、难点以及机会的东西,与他当时超越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政治、文化缺乏远见的近视症患者,作为‘专家’的艰辛努力联系起来,这样就逐渐发现了他的重要性。”龙夫威还说:“我确信,徐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不单纯是对西方刺激的肤浅条件反射,更重要的是一个精心构想的行动计划——只能用他对中国文化基础的根本信念来解释。正因为有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的忠诚,才激发徐这个反对英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者、中国领土的保卫者,去探究外国的实情,支持和解政策,从而使中国做好未来的准备。其文化背景的显著特色——他的知识渊源,政治交往,乡土传统——给了他突破文化壁垒,寻求新的真理的勇气和信心。”“徐继畲面对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早已在近代框架之内寻找理解和同一性……他的所作所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鸿沟上,以互相交流为使命的、有创造力的、开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桥梁。”

徐继畲从研究西方强国的发迹轨道中,看到了欧美

早期近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比封建专制具有优越性。他着重向国人介绍两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即“英国女王”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总统式的民主共和制。从其论述来看,他更倾慕于米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他又满腔热情地讲述了早期近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如纺织业的发展,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的机械工业的发展,铁路、公路及海运交通运输业的发达,随之而来的国内外通商行业的发展,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所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等等。徐继畲敢于向国人启蒙,展示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先进的、合于时宜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行为。龙夫威教授评价说:“实际上,徐继畲的拓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

(责任编辑 吴思)



欢迎订阅《文汇读书周报》

创刊于1985年,全国邮发数第一的读书类报纸,每期16版。

柯灵:《周报》办得好,有助于发扬读书风气,值得感谢。

王元化:凡有重要文章,我都要发在《文汇读书周报》或《新民晚报》上。

蒋孔阳:《周报》以其信息的丰富、栏目的众多而引人注目。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不仅报道了学术研究的动态,评述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而且还通过简介等方式广泛涉及到一些时势和史料问题,从而亦庄亦谐,趣味和学问,并行不悖。

钱谷融:说心里话,这张报纸办得真好,品位十分高。据我所知,全国的知识界,各地的人文学术圈子,都有你们的忠实读者,对你们都有好评。你们真正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喜爱。

刊号:3-40,本报寄赠样报,以供试读。零售价:1.00元,月订价4.20元,年订价50.4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或拨打“185”即可。地址:上海威海路755号(200041) E-mail:lyj@wxjt.com.cn

# 说 附 和

##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三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起居注》是中国专制主义时代记录君主言行的资料。主管记录的是史官。君主是天子，他的言行当然就是天意。天意难违，百官和百姓本只有拥护和服从的份儿。不过据说，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天子若有违背天意的时候，史官也要如实记录，以保留真相。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可疑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话一句耳。谁惧了？天知道。敢于冒死直书如董狐与齐太史之俦，看来也只是少数特例。正如作《史通》的刘知几所说：这世界上，倒是正道不走邪道的小人居多。为什么？无非因为“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多数人“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顺从保吉的多了，什么事情都舞文弄墨附和君主，要保留真相，谈何容易！这就难怪章学诚要感叹“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了。

明白这一点，对于各种官修的史书，就要多一个心眼儿，免得尽信书而被它瞒过。

不过，官修史书中也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只要会读，可以从中推知一些真相。

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一个康熙，一个乾隆，留下的碑题最多。康熙爱写字，这是真的，在写字上下过一番功夫，这也是真的，起居注里多有记载。有一段记叙很有趣味：有一次，康熙问左右满族大臣道：“我看到朱熹这帮人说，字都被苏（轼）黄（庭坚）胡乱写坏了。你们听到那些汉人大学士对这种批评怎样说？”因为是问汉族大臣的看法，几位满族大臣立即转述了听到的说法——“汉人大学士说，朱熹这拨儿人与苏轼那拨儿人各自为党，所以这样攻讦。不过，苏轼的真迹现在已很难得到了”——但他们自己是不表态的。康熙说道：“苏轼、黄庭坚的文章书法，后人至今还在模仿。可见那种批评是很偏颇的。”接着康熙叹道：“我又好久没有写字了。”一听到皇帝这样明确表态，气氛立即变了。左右大臣竞相跟上。说：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这话确实偏私，正如皇上所指出的那样。”说：“读书人每天练习写字，应该都会写，可有的人一辈子也写不成样。这就是天分不够。皇上您是天纵之圣，写的字尽善尽美，真是大家的楷模啊！”说：“能像皇上这样善于写字的，古今少有。何不多写些，让万世流传无极。”还有人恭请皇上“时御毫素”，以便“臣等幸得御笔，藏之于家，以为鸿宝，让子孙传之无穷。”

瞧，一场以学术性问题开场的讨论，转瞬之间就成了歌功颂德的竞赛。而且这种附和阿谀的竞赛是在官僚集团最高层毫不遮掩地进行着。

另一段起居注的记载也同样有趣。还是康熙，有一次在北巡途中，同随行大臣谈到了一个叫穆尔赛的官员。他说：“我听说穆尔赛居官不善。你们知道吗？”在这之前看来是没有任何一个左右大臣向他报告过穆尔赛的问题。但皇上一说，左右的话匣子一下全打开了。有人说：“就像皇上您英明指出的那样，穆尔赛为人昏聩，不能办事。”有人说：“穆尔赛的贪，大家都知道。”还有人言之凿凿：“我往西岳祭祀时，那一带州县官员提到穆尔赛都叫苦连天。穆尔赛的名声实在不好。”有人说：“这样的人，天理也断不能容他！”从左右的应答来看，他们似乎对穆尔赛的问题早就知情，但谁也不开口。待到皇上一说，便如河之决，人人都成了先知先觉。

一个君王周围如果聚集着这样一批不知办事、只知附和之徒，一定是非常寂寞也非常孤独的。但也一定会养成君王的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制度就是这样铸造人的性情：它把所有臣下都铸成唯唯诺诺、只知附和的奴才；也把君王铸成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的暴君，因为他已经习惯于听取赞歌和接受无休无止的附和与恭维了。诗曰：

赞歌唱罢骨筋酥，奉主一人众作奴。  
秦帝有知当笑慰，传家有道朕非孤。



# 国画家——荣宏君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新华街甲1号中兴酒店  
B1. 2118艺术工作室 邮编：100051  
电话：63022731-181 手机：13520278106

荣宏君，画家。师承国画大师关山月、于志学，并拜师著名学者、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学习古典诗词及文物、书、画鉴赏。

1999年07月出访香港、澳门做文化交流。

1999年11月参与举办“聂荣臻元帅百年诞辰书画展”，及大型画册出版编辑工作。

2000年11月参与举办首都著名书画家“庆澳门回归画展”

2001年04月参与举办首都著名书画家“庆祝奥运申办成功书画创作笔会”

2002年05月策划首都百名书画家为失足青少年捐赠图书活动，在社会引起广泛影响。

2003年02月由史树青先生题写书名的《荣宏君画集》出版。

2003年05月史树青、韩静霆、任继民、荣宏君为抗击非典作品义拍。

2003年07月陪同著名画家于志学老师考察可可西里无人区。

2003年10月于志学、任继民、荣宏君金色十月画展在北京北海举办。

2003年10月史树青、雷正民、于志学、任继民、荣宏君书画展在鞍山里仁馆展出。

2004年元月1日-5日荣宏君“情系梅魂”个人画展在琉璃厂来薰阁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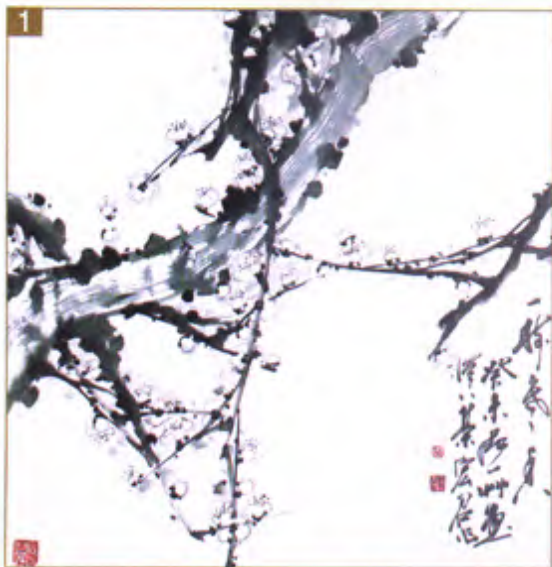
2004年2月作品《香闻流水处》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中央电视台二套、三套、四套及中国金融时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山东齐鲁晚报有专门报道。

## 国画家荣宏君部分作品

1	4
2	
3	

《一树寒香》  
《不随浓艳竞纷华》  
《一日东风一日香》  
《报春》荣宏君作 史树青题



# 炎黄春秋

2004/4(总第 145 期)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执行主编:李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底先华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010)68532569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